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冰心作品集

一九八五年



1985 年作品集

冰 心 著

目 录

1985 年

- 致陈恕 (1月1日) (2)
- 致巴金 (1月18日) (4)
- 《冰心著译选集》自序 (5)
- 致陈祖芬 (1月19日) (8)
- 我的祝贺 (9)
- 意外的收获 (10)
- 童年的春节 (14)
- 给故乡青年的春节贺词 (18)
- 最愉快的两件事 (19)
- 致谢宗惠、谢宗懋 (2月16日) (21)
- 《伏枥杂记》序 (23)
- 春节忆春联 (25)
- 致臧克家 (2月25日) (27)
- 由春联想到联句 (28)
- 关于男人 (之二)

三 我的小舅舅	(31)
我的大学生涯	(36)
我为什么翻译《先知》和《吉檀迦利》	(49)
“由岑散文”序	(51)
从联句又想到集句	(53)
致葛翠琳 (4月3日)	(56)
霞	(57)
致宫玺 (5月4日)	(59)
写给民进女会友、女教师的一封信	(60)
关于男人 (之三)	
四 我的老师——管叶羽先生	(63)
介绍《今夜月色好》	(67)
致海外朋友和同胞	(69)
梁实秋《忆故知》序	(72)
致王安忆 (6月19日)	(75)
《陈伯吹传》序	(76)
致李小林 (7月1日)	(78)
致宫玺 (7月6日)	(79)
致王安忆 (7月13日)	(80)
《应当尊敬的人》序	(81)
致巴金 (7月22日)	(82)
致王安忆 (7月22日)	(83)

致李準 (7月23日)	(84)
关于男人 (之四)	
五 我的表亲们	(86)
致王安忆 (8月3日)	(90)
喜悦 期待	(91)
致肖凤 (8月8日)	(93)
致巴金 (8月15日)	(94)
致编委会同志 (8月24日)	(95)
为《语文报》题词	(96)
我注意寻看安忆的作品	(97)
希望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尊师	(102)
致臧克家 (9月9日)	(104)
致周达宝 (9月18日)	(105)
喜读袁鹰的《秋水》集	(106)
致巴金 (10月4日)	(108)
致赵清阁 (10月7日)	(109)
回忆中的金岳老	(110)
漫谈集句	(112)
衷心的感谢	(116)
致巴金 (11月8日)	(121)
致宫玺 (11月11日)	(123)
为整治西湖题词	(124)
我为什么写《樱花赞》	(125)

喜读萧乾《漫话北京城》	(127)
我与散文	(129)
一股“黄山的人字瀑” ——推荐《经济和人》	(131)
读了《北京城杂忆》	(134)
致巴金（12月29日）	(137)
致陈慧瑛（12月29日）	(139)

1985 年

致 陈 恕

亲爱的陈恕：

你的圣诞节的信，今天新年初一就收到了，真是快的很！咪咪现在就在我桌上趴着，它更胖更大了，老二不在家时多，它就差不多整天在我桌上，或旁边椅子的软垫上，它和我是“鱼肉之交”！

说起电话，直线有了，民院的也没有拆走，直线的在你们那边，倒是丹丹钢钢用的多，天天晚上在那边和朋友说话，有时还跟山山通话。

这两天作协在北京开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初一）早上就来了好几批人，热闹得很。明后天我估计还有人来。

Daddie 情况还好，日夜有人看护，我们也放心，该去看的日子，都有人去。今天二舅母来电话说二舅舅腿有点肿，上医院检查没有大关系，不日可以回家。三舅舅也在医院里，已一个多月了，是肾不好，也没有太大问题。反正都老了，我还算好的。老二太爱管闲事，功课也太多，不知是怎么安排的，因此太

忙，你回来就大家安顿了！

祝好！

娘

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

致 巴 金

老巴：

得你信本想即复，因为忙于看望文藻，耽误了，不料我自己也因心绞痛进医院住了十天！现已全愈回来，勿挂。我们同住一医院（北京医院），我却瞒了文藻直到最后一天，才上楼看他。他还好，只是忙了孩子们！你说友情是最好的药物，关于这一点，你有着我的全部友情，你一定要劳逸结合！告诉小林，吴青看到了她在信尾的附言，我们都希望你们春天能来一趟。“三集”收到没有？请看 276 页谈友谊，381 页谈生命。

谢谢小林的美丽贺年片！

冰 心

一、十八

《冰心著译选集》自序

海峡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福建作家丛书”，要出我的集子，我觉得很惭愧。近年来由不同的出版社出的我的集子，已有好几种，编来编去就是那几篇东西，自己看着也厌烦，不用说读者们了！但是作为一个福建人，对于故乡从来没有一点贡献，若是连一本集子也不敢献出，也太说不过去，我只好应承了。

聊可自恕的是：这本集子与其他集子不同的，除了小说、诗、散文之外，还收集了我的一些译文。对于外国语文，我只懂一门英文，还不精通（我在大学时期，曾读过一年的法文。在美国留学时期，因要取得硕士学位，要求在本国语文之外，必须会两种外语。我就在暑期补习了两个月的法文，应付过硕士的答辩之后，便又丢开了）。但是每逢我读到优美的、用英文写的诗文时，就口译或笔译出来，让不懂英文的

人，如我的母亲，让她分享一些美的享受。这些零星的译稿都一直没有收集起来。1930年母亲逝世以后，我病中无聊，把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先知》译了出来，正好上海“新月社”向我索稿，就把这本译诗交给他们出版了。后来我又翻译了一些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和小说，我最喜爱的是他的散文诗集《吉檀迦利》。这本诗和《先知》有异曲同工之妙，充满了画意和诗情。不过泰戈尔的情调是更天真，更欢畅，更富于神秘色彩；而纪伯伦的作品，却更严肃，更富于哲理，还带些淡淡的悲凉！这两位诗人的作品，都是他们自己用英文写的，而不是经过别人从孟加拉文和阿拉伯文译成英文的，我译起来在“信”字上，就可以自己负责。我从来不敢重译！除了这两位作家的作品之外，我还翻译了一些其他的诗文，也有是重译的，那是给我的任务。我只好从英文中重译过来，但我也尽了我的努力。

我们福建出过两位译述大家，严复和林纾。这两位老先生都是我祖父的朋友，严老先生还是我父亲的老师。我的翻译工作比起他们的来，真是太微不足道了！但是我们福建山川灵秀，文风不堕。八闽子弟多才俊，我希望故乡的青少年们，好好地学习本国语文，再好好地学习一两种外国语文，把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译述工作担负起来，蝉联下去，代代不绝。

1985 年 1 月 19 日

(《冰心著译选集》，海峡文艺出版社 1986 年 11 月初版。)

致陈祖芬^①

祖芬同志：

书收到了，正在拜读，谢谢。你和祖德的来访，我就知道你是能听出弦外之音的人，我很喜欢认识你！我从不出门，很难在公共会所见到你，你如有空，请来寒舍小坐。我这里极其清静，地址和电话，记得上次已告诉你了。

冰 心

一、十九、

（此信系周达宝同志征集。）

^① 陈祖芬，女作家。1943年生，上海人。1964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1978年开始创作报告文学。主要作品有《祖国高于一切》、《共产党人》、《催人复苏的事业》。出版了《青春的证明》、《挑战与机会》等。

我的祝贺

《儿童时代》创刊三十五年了。三十五年来，它一直谨严地遵守着宋庆龄同志的的指示：“给儿童指示正确的道路，启发他们的思想，使他们走向光明灿烂的境地。”我祝愿《儿童时代》在已有的优异成绩上，更加满怀热情地拉起新中国两亿儿童的手，引导他们和“八十年代”同步地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本篇最初发表于《儿童时代》1985年第4期。）

意外的收获

《瞭望》杂志（海外版）让记者张慧贤同志来，要我向海外同胞介绍去年北京市妇女联合会等四个单位，联合主办小学生作文比赛的情况，并带来几份小学生的作文。这个任务来得很突然，我刚从医院归来，身心交瘁，很难执笔，但是看了几篇得奖的小学生作文以后，我感到还有些话可以向海外同胞报告一下。

这征文的缘起是这样的：去年上半年，由北京市妇联、北京市教育局、北京市家庭研究会和《北京晚报》，联合主办北京市小学生《我的妈妈》专题作文比赛，不久就收到应征的小学生作文十五万六千份。去年的下半年，又主办了《我的爸爸》征文比赛，在短短一个月內，又收到应征作文二十三万份！也就是说这三十八万六千篇短文，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八十年代北京城乡的几十万年轻的爸爸妈妈的形象和

几十万个小学生的观察和判断。

这些征文都请了儿童教育家、儿童文学家和教师们来参加评定。奖品也分等次，有文具、玩具、糖果等，也不用去细说了。

从记者同志送来的几篇得奖的作文里，我感到有意外的收获。就是我国八十年代的小学生的观察是锐敏的，判断也很公正。他们对于日夕相处的爸爸妈妈，或家庭中其他成员的优点和缺点，都看得很清楚，描写得也很深刻细腻，比如方晨小同学写的《我的爸爸》，就拿他的爸爸鼓励他看电视上的动物世界节目，并且观察一切动物的习性和生长，跟他的姑妈只抓紧她的女儿要考上重点中学，不让她女儿看电视、去动物园等等做了比较。这里可以看出他不是一个读死书而不注意到四周动态和信息的孩子。

又比如唐敦皓小同学（他是一位乐师和一位名演员的儿子），本来因为来幼儿园接他的爸爸被同学称为爷爷而感到“很不是滋味”，而“恼怒”。后来他知道了他的父母是为了忠于他们的专业，走遍了国内国外，去演唱弹奏，而耽误了婚期，以至于自己是在爸爸五十岁、妈妈四十岁时才出生。他终于为“这样的爸爸，感到骄傲和自豪”。

小学生荀涛对于他的爸爸是敬重的，说他“什么都好，每天早出晚归，工作兢兢业业”，“只是烟抽得

太凶了。”他描写一位因专心工作而不能戒烟的人，描写得很细，也很幽默。他最后写“‘吧嗒……嘘……吧嗒’这三部曲，几时才能在我家消失呢？”他对于爸爸的抽烟习惯是无可奈何了！

小学生威威，对于她的继母本来是有戒心的。后来经过了生活中的实践，她觉得她的新妈妈是和她的亲妈妈一样疼爱体贴她。她最后写“九泉之下的妈妈呀，您放心吧，您安息吧，因为我有了一位好妈妈。”

小学生张丽华，是一个农村的孩子。因为她妈妈去领劳动报酬时，本应该是两千五百元，而会计因为算错了，多给了她三百元，她回来算来算去，觉得不对，把多算的三百元又送了回去，那个会计惭愧地说“大嫂，我一时马虎……幸亏遇到了你这么一个人，国家财产才没有受损失！”张丽华看到周围的人向妈妈投来赞许敬佩的眼光时，她感到有无限的自豪！

不必再多介绍了，我想《瞭望》杂志会附载几篇小同学的作文以供海外同胞们的阅读欣赏。总之，从一些小学生所反映的他们父母的形象里，可以看出新中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北京城乡出现的可喜变化和家庭生活的新气象，以及小学生们思想和写作的水平，我想海外同胞一定看了会高兴的。

1985 年 1 月 28 日急就

(本篇最初发表于《瞭望》1985 年 2 月 18 日第 7 期。)

童年的春节

我童年生活中，不光是海边山上孤单寂寞的独往独来，也有热闹得锣鼓喧天的时候，那便是从前的“新年”，现在叫做“春节”的。

那时我家住在烟台海军学校后面的东南山窝里，附近只有几个村落，进烟台市还要越过一座东山，算是最冷僻的一角了，但是“过年”还是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

过年的前几天，最忙的是母亲了。她忙着打点我们过年穿的新衣鞋帽，还有一家大小半个月吃的肉，因为那里的习惯，从正月初一到十五是不宰猪卖肉的。我看见母亲系起围裙、挽上袖子，往大坛子里装大块大块的喷香的裹满“红糟”的糟肉，还有用酱油、白糖和各种香料煮的卤肉，还蒸上好几笼屉的红糖年糕……当母亲做这些事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不只有我们几个馋孩子，还有在旁边帮忙的厨师傅和余妈。

父亲呢，就为放学的孩子们准备新年的娱乐。在海军学校上学的不但有我的堂哥哥，还有表哥哥。真是“一表三千里”，什么姑表哥，舅表哥，姨表哥，至少有七八个。父亲从烟台市上买回一套吹打乐器，锣、鼓、箫、笛、二胡、月琴……弹奏起来，真是热闹得很。只是我挤不进他们的乐队里去！我只能白天放些父亲给我们买回来的鞭炮，晚上放些烟火。大的是一筒一筒的放在地上放，火树银花，璀璨得很！我最喜欢的还是一种最小、最简单的“滴滴金”。那是一条小纸捻，卷着一点火药，可以拿在手里点起来嗤嗤地响，爆出点点火星。

记得我们初一早起，换上新衣新鞋，先拜祖宗——我们家不供神佛——供桌上只有祖宗牌位、香、烛和祭品，这一桌酒菜就是我们新年的午餐——然后给父母亲和长辈拜年，我拿到的红纸包里的压岁钱，大多是一圆锃亮的墨西哥“站人”银元，我都请母亲替我收起。

最有趣的还是从各个农村来耍“花会”的了，演员们都是各个村落里冬闲的农民，节目大多是“跑旱船”，和“王大娘锅大缸”之类，演女角的都是村里的年轻人，搽着很厚的脂粉。鼓乐前导，后面就簇拥着许多小孩子。到我家门首，自然就围上一大群人，于是他们就穿走演唱了起来，有乐器伴奏，歌曲大都

滑稽可笑，引得大家笑声不断。耍完了，我们就拿烟、酒、点心慰劳他们。这个村的花会刚走，那个村的又来了，最先来到的自然是离我们最近的金钩寨的花会！

我十一岁那年，回到故乡的福建福州，那里过年又热闹多了。我们大家庭里是四房同居分吃，祖父是和我们这一房在一起吃饭的。从腊月廿三日起，大家就忙着扫房，擦洗门窗和铜锡器具，准备糟和腌的鸡、鸭、鱼、肉。祖父只忙着写春联，贴在擦得锃亮的大门或旁门上。他自己在元旦这天早上，还用红纸写一条：“元旦开业，新春大吉……”以下还有什么吉利话，我就不认得也不记得了。

新年里，我们各人从自己的“姥姥家”得到许多好东西。首先是灶糖、灶饼，那是一盒一盒的糖和点心。据说是祭灶王爷用的，糖和点心都很甜也很粘，为的是把灶王的嘴糊上，使得他上天不能汇报这家人的坏话！最好的东西，还是灯笼，福州方言，“灯”和“丁”同音，因此送灯的数目，总比孩子的数目多一些，是添丁的意思。那时我的弟弟们还小，不会和我抢，多的那一盏总是给我。这些灯：有纸的，有纱的，还有玻璃的……于是我屋墙上挂的是“走马灯”，上面的人物是“三英战吕布”，手里提的是两眼会活动的金鱼灯，另一手就拉着一盏脚下有轮子的

“白兔灯”。同时我家所在的南后街，本是个灯市，这一条街上大多是灯铺。我家门口的“万兴桶石店”，平时除了卖各种红漆金边的伴嫁用的大小桶子之外，就兼卖各种的灯。那就不是孩子们举着玩的灯笼了，而是上面画着精细的花鸟人物的大玻璃灯、纱灯、料丝灯、牛角灯等等，元宵之夜，都点了起来，真是“花市灯如昼”，游人如织，欢笑满街！

元宵过后，一年一度的光采辉煌的日子，就完结了。当大人们让我们把许多玩够了的灯笼，放在一起烧了之后，说：“从明天起，好好收收心上学去吧。”我们默默地听着，看着天井里那些灯笼的星星余烬，恋恋不舍地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惆怅寂寞之感，上床睡觉的时候，这一夜的滋味真不好过！

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童年》1985年第1期。）

给故乡青年的春节贺词

我对故乡的青年们非常关心。福州是个沿海的城市，对外的接触相当多，所得的信息也比较快，进步也比较快。我希望故乡的青年们努力地跟国家一起同步地走向四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贺词刊于《福建广播电视》1985年2月15日。）

最痛快的两件事

近月来有两件事，使得在闲居中的我，一想起来，就从心里安慰和喜乐。一是中小学的老师们待遇提高了。中小学的老师是最辛勤的守护苗圃的园丁！他们日日夜夜守护调理着千千万万的幼芽，使他们都能受到“三热爱”教育的阳光和雨露，而能抵御精神污染的侵袭，使他们都得以茁壮成长，成为参天的大树，国家的栋梁。半个世纪以前，我在欧、美和日本旅行的时候，我常感到他们对于中小学老师们的待遇，如工资和居住、工作、福利的条件，都比中国好得很多。我觉得这是他们政府把重视中小学教育作为战略任务的最明显的表现。如今我们新中国的教育当局也把提高中小学教师种种待遇，作为国家的重要措施，这是使我极其高兴的事！二是由总理亲自提出，由人大常委通过的，定每年九月十日为教师节这个盛典。（我们民进酝酿提议应该有个教师节，已经有好几年了，一旦得到实现，我们的高兴是

说不完的!)我不能多说什么,我只能设想,假如我现在仍是一个小学或中学的学生,我就首先努力以我的优异的学习成绩,来表示我敬爱的老师在我身上所用的苦心。再则在九月十日那天写一封信,一盆或一束自己栽培的鲜花,一件自己手制的工艺品,比如剪纸……送给我所敬爱的老师,我想我的老师一定会含笑甚至含泪接受我的诚恳的礼物的。可悲的是,我敬爱的老师,如家塾里的王老师……中学里的丁老师……大学里的管老师……如今都不在人间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民进》1985年第3期。)

致谢宗惠、谢宗慤

亲爱的大小弟^①：

得大弟二月十一日信，十分高兴。姑爹住院四个多月，已于十三日出院，情况尚好，夜间仍请人照料。我也因心绞痛，住院十三天，今已全愈，勿挂！我们都是老人，病甚至死，都是规律，能活到八十几岁，已是想不到的了。你爸爸千万不可自己大意，冷暖自己不经心，只是苦了守护的人。小弟来兰州否？这孩子真要强，大小弟感情也好，我最欣慰。小华是不是宗爱的孩子？告诉她姑奶奶常惦记她。我最高兴的是你分到房子（住址告诉我们，可直接寄信），朝阳的最好，五楼更好，安静一些。你们一定能把爸爸照顾好，这是我唯一心事。二伯父最近身体也不太好，我们常通电话。你的信，我总寄给他看。这信给爸爸看，亲你们三口！

^① 大弟是冰心的三弟谢为楫的大儿子谢宗惠；小弟是谢为楫的小儿子谢宗慤。

姑 姑

二月十六

哥哥姐姐们都忙得不得了，都好，尤其是二姐，她照顾我们。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伏枥杂记》序

二十三年前，我曾陆续写了一些短文，题目是《拾穗小札》。那是记下一些给我留下印象的参观、访问、看戏、听歌，或书报刊物上的感人警句，和好友谈话中的三言两语。不记下来觉得可惜，因而看到就写，想起就写，结果集成了一本《拾穗小札》。这本小书的写作经过曾得到《北京晚报》编辑同志的支持和催迫。我至今还感谢他们。

一九八〇年访日归来以后，因为赶了些积欠已久的翻译任务，不幸得了脑血栓，后来又患右腿骨折，一切社会活动都不能参加。参观、访问、看戏、听歌当然都做不到了。我是个好动的人，“闭居”对我来说，是个痛苦！每每有故乡福建来人，劝我去游武夷；烟台第二故乡来人，请我重访东山等等，我就想起《诗经》的两句：“静言思之，不能奋飞”！这种力不从心的矛盾，常常使我难过得暗自流泪。可幸的是除了行动不便之外，我的脑子还能思索，我的右手

也还可以写字，同时一些现代的便利：如收音机、电视和一些书报刊物，以及朋友们的来访和信函，使我在“闭居”中仍然可以看到和听到他们的音、容、创作和海内外的一些信息，使我聊可自慰。

但我也常常想起曹操的两句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骥马也罢，弩马也罢，“伏枥”是一样的。近年来醒得很早，往往到下半夜就目光炯炯了。虽不“志在千里”而长夜漫漫，几十年中的往事，纷至沓来。如果都写下来，我想倒是有趣的，于是再写《伏枥杂记》。

1985年2月18日

春节忆春联

中学时代，天天上学，从东北城的中剪子巷家里，走到灯市口的贝满女中，特别是春节——那时就是新年，——前后，总会看到路边的店铺和人家门口贴的新春联。店铺门口的多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至于人家呢，多半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不平凡的，就是：“努力崇明德，随时爱景光”之类的了！

我最记得的是从南剪子巷南口到大佛寺的转折处，有一家有门洞的房子，大门两边挂着一对木板刻的对联：

学士青莲尚书红杏
中郎绿绮太史黄庭

我觉得这副对联对得十分工整。不但有四位名人文士的外号和官职，而且有这四位名人因而得名

的事迹。我昨天还为弄清这几段故事，特意去查了《辞海》。“学士青莲”当然说的是唐朝的青莲居士李白了。“尚书红杏”指的是在宋朝因写了一句“红杏枝头春意闹”而出名的尚书宋祁。“中郎绿绮”是汉朝蔡邕中郎有一张蕉尾琴（那时的琴也称绿绮）。“太史黄庭”是指的晋朝王羲之写的《大上黄庭内景经》。

这所房子在三十年代中我也曾进去过。因为那时曾是任叔永和陈衡哲先生夫妇的住宅。我们到他们家做过客，房子有好几进，也很大。但这副对联是什么人写的，他们也不知道。

1985年2月18日

（以上两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85年2月22日。）

致臧克家

克家同志：

近来我们都不太好，到底是老了！文藻因病住院 9 个月，我也于十二月因心绞痛住院半个月，现在都已回家。得来信知道您也得病两次，我劝你还是少活动、少会客，有空写点短诗文，比什么都好。

祝

好！

冰 心

二、廿五

（此信系周达宝同志征集。）

由春联想到联句

也许是上学路上看到的，也许不是，我曾看到一个很破烂的人家门口的一副对联，是：

两间东倒西歪屋
一个千锤百炼人

不知里面住的是否一位打铁的，但这副对联，就很不俗气了！

我还听到一位长辈对我的父亲谈到一副对联是：

岂有文章惊海内
更无书札到公卿

这位长辈认为它很有一股清高旷达之气。父亲没有说什么，我当然也不敢说什么，但我却认为他若

真是一个清高旷达的人，决不会把这两句话标榜在大门上的！

我倒是很喜欢这位前辈说的：当庚子年后，东交民巷被划为使馆区，一位在里面住的文人，在门口贴上一对春联，是：

望洋兴叹
与鬼为邻

这副联中不但标出洋鬼字样，也发泄了他的愤懑屈辱之气。

这两天我窗台上的水仙开得正好，有一枝五六朵的，甚至有八九朵的，那都是从福建来的同乡带来的——那是在作协开会期间，郭风、马宁、何为、许怀中等九位同志，其中有“万红丛中一点绿”，是我久仰初次见面的舒婷同志，她穿的是白地绿花一件毛衣，我拉她在我旁边坐下，可惜他们很忙，放下一大包的水仙花苞就走了，没有多谈。我把这些水仙，请人“挖”了，棵棵都开得很好。我一看是盛开的清香缭绕的水仙，就猛然想起一首咏水仙诗中的两句，是：

生意不需沾寸土

通词直欲托微波

由此又想到有咏牡丹诗中的两句，是，

得天独厚开盈尺
与月同圆到十分

但我觉得还不如这一对：

十里散香苏地脉
万花低首避天人

记得我曾用这两句诗题胡絮青同志画的牡丹。我对于牡丹不太熟悉，也不知道她怎会得花王之称。不过这两句诗很好，与

独立中流喧日夜
万山无语看焦山

有异曲同工之妙。有客来了，就此打住！

1985年2月27日微雪之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85年3月8日。）

关于男人（之二）

三 我的小舅舅

我的小舅舅杨子玉先生，是我的外叔祖父杨颂岩老先生的儿子。外叔祖先有三个女儿，晚年得子，就给他起名叫喜哥，虽然我的三位姨母的名字并不是福、禄、寿！我们都叫他喜舅。他是我们最喜爱的小长辈。他从不腻烦小孩子，又最爱讲故事，讲得津津有味，似乎在讲故事中，自己也得到最大的快乐。

他在唐山路矿学校读书的时候，夏天就到烟台来度假，这时我们家就热闹起来了。他喜欢喝酒，母亲每晚必给他预备一瓶绍兴和一点下酒好菜。父亲吃饭是最快的，他还是按着几十年前海军学堂的习惯，三分钟内就把饭吃完，离桌站起了。可是喜舅还是慢慢地嚼，慢慢地吃，还总是把一片笋或一朵菜花，一粒花生翻来覆去地夹着看，不立时下箸。母亲就只好坐在桌边陪他。他酒后兴致最好，这时等在桌

边的我们，就哄围过来，请他讲故事。现在回想起来，他总是先从笑话或鬼怪故事讲起，最后也还是讲一些同盟会的宣传推翻清廷的故事。他假满回校，还常给我们写信，也常寄诗。我记得他有《登万里长城》一首：

划地界夷华
秦王计亦差
怀柔如有道
胡越可为家

安用驱丁壮
翻因起怨嗟
而今凭吊处
不复有鸣笳

还有一首《日夜寄内》，那是他结婚后之作，很短，以他的爱人的口气写的。

之子不归来
楼头空怅望
新月来弄人
幻出刀环样

我在中学时代，他正做着铁路测量工作，每次都是从北京出发，因此他也常到北京来。他一离开北京，就由我负责给他寄北京的报纸，寄到江西萍乡等地。测量途中，他还常寄途中即景的诗，我只记得一两句，如

瘦牛伏水成奇石

他在北京等待任务的时间，十分注意我的学习。他还似乎有意把我培养成一个“才女”。他鼓励我学写字，给我买了许多字帖，还说要先学“颜”，以后再转学“柳”、学“赵”。又给我买了许多颜料和画谱，劝我学画。他还买了很讲究的棋盘和黑白棋子，教我下围棋，说是“围棋不难下，只要能留得一个不死的口子，就输不了”。他还送我一架风琴，因此我初入贝满中学时，还交了学琴的费。但我只学了三个星期就退学了，因为我一看见练习指法的琴谱，就头痛。总之，我是个好动的、坐不住的孩子，身子里又没有音乐和艺术的细胞！和琴、棋、书、画都结不上因缘。喜舅给我买的许多诗集中，我最不喜欢《随园女弟子诗集》而我却迷上了龚定庵、黄仲则和纳兰成德。

二十年代初期，喜舅就回到福建的建设厅去工

作了，我也入了大学，彼此都忙了起来，通信由稀疏而渐渐断绝。总之，他在我身上“耕耘”最多，而“收获”最少，我辜负了他，因为他在自己的侄子们甚至于自己的儿子身上，也没有操过这么多的心！

这里应该补上一段插曲。一九一一年，我们家回到福州故乡的时候，喜舅已先我们回去了。他一定参与了光复福建之役。我只觉得他和他的朋友们——都是以后到我北京家里来过，在父亲书斋里长谈的那些人——仿佛都忙得很，到我家来，也很少找我们说笑。有时我从“同盟会”门口经过——我忘了是什么巷，大约离我们家不远——常见他坐在大厅上和许多人高谈阔论。他和我的父亲对当时的福建都督彭寿松都很不满，说是“换汤不换药”。我记得那时父亲闲着没事，就用民歌“播间祭”的调子，编了好几首讽刺彭寿松的歌子。喜舅来了，就和我们一同唱着玩，他说是“出出气！”这些歌子我一句也不记得了，《播间祭》的原歌也有好几首，我倒记得一首，虽然还不全。这歌是根据《孟子》的离娄章里“齐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这妻妾发现齐人是到播间乞食，回来却骄傲地自诩是到富贵人家去赴宴，她们就“羞泣”地唱了起来。调子很好听，我听了就忘不了！这首是妻唱的：

移步出家庭

×××××

家家插柳，时节值清明
出东门好一派水秀山明
哎呵，对景倍伤情！

第二首是妾唱的，情绪就好得多！说什么“昨夜灯前，细（？）踏青鞋”。一提起《墦间祭》，又把许多我在故乡学唱闽歌的往事，涌到心上来了。

一九八五年三月三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作家》1985年第3期。）

我的大学生涯

这是我自传的第五部分了（一、我的故乡。二、我的童年。三、我到了北京。四、我入了贝满中学。）每段都只有几千字，因为我不惯于写叙述性的文章，而且回忆时都是些零碎的细节，拼在一起又太繁琐了。但是在我的短文里，关于这一段时期的叙述是比较少的，而这一段却是我一生中最热闹、最活跃、精力最充沛的一段。

我从贝满中斋毕了业，就直接升入了协和女子大学。我选的是理预科，因为我一心一意想学医，对于数、理、化的功课，十分用功，成绩也好。至于中文呢，因为那时教会学校请的中文老师，多半是前清的秀才或举人，讲的都是我在家塾里或自己读过的古文，他们讲书时也不会旁征侧引，十分无趣。我入了理科，就埋头苦学，学校生活如同止水一般地静寂，只有一件事，使我永志不忘！

我是在夏末秋初，进了协和女子大学的校门的，

这协和女大本是清朝的佟王府第，在大门前抬头就看见当时女书法家吴芝瑛女士写的“协和女子大学学校”的金字蓝地花边的匾额。走进二门，忽然看见了由王府前三间大厅改成的大礼堂的长廊下，开满了长长的一大片猩红的大玫瑰花！这些玫瑰花第一次打进了我的眼帘，从此我就一辈子爱上了这我认为 是艳冠群芳、又有风骨的花朵，又似乎是她揭开了我生命中最绚烂的一页。

理科的功课是严紧的，新的同学们更是来自五湖四海，大多数比我大好几岁。除了从贝满女中升上来的同学以外，我又结识了许多同学。那时我弟弟们也 都上学了。在大学我仍是走读，每天晚餐后，和弟弟们在饭桌旁各据一方，一面自己温课，一面帮助他们学习，看到他们困倦了时，就立起来同他们做些游戏。早起我自己一面梳头的时候，一面还督促他们“背书”。现在回忆起来，在这些最单调的日子里，我只记得在此期间有一次的大风沙，那时北京本有“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谚语，春天风多风大，不必说了，而街道又完全是黄土铺的，每天放学回来总得先洗脸，洗脖子。我记得这一天下午，我们正在试验室里，由一位美国女教师带领着，解剖死猫，忽然狂风大作，尘沙蔽天，电灯也不亮了，连注射过红药水的猫 的神经，都看不出来。教师只得皱眉说：“先

把死猫盖上布，收在橱子里吧，明天晴了再说。”这时住校的同学都跑回到自己屋里去了。我包上很厚的头巾，在扑面的尘沙中抱肩低头、昏天黑地的走回家里，看见家里廊上窗台上的沙土，至少有两寸厚！

其实这种大风沙的日子，在当时的北京并不罕见，只因后来我的学校生活，忽然热闹而烦恼了起来，也就记不得天气的变迁了！

在理预科学习的紧张而严肃的日子，只过了大半年，到了第二年——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起来了，我虽然是个班次很低的“大学生”，也一下子被卷进了这兴奋而伟大的运动。关于这一段我写过不少，在此就不多说了。我要说的就是因为我因为参加运动又开始写些东西，耽误了许许多多理科实验的功课，幸而理科老师们还能体谅我，我敷衍敷衍地读完了两年理科，就转入文科，还升了一班！

改入文科以后，功课就轻松多了！就是这一年——一九二〇年，协和女子大学，同通州的潞河大学和北京的协和大学合并成燕京大学。校长是司徒雷登。我们协和女子大学就改称“燕大女校”。有的功课是在男校上课，如“哲学”、“教育学”等，有的是在女校上的，如“社会学”、“心理学”等。在男校上课时，我们就都到男校所在地的盔甲厂去。当时男女合校还是一件很新鲜的事，因此我们都很拘谨，在到

男校上课以前，都注意把头上戴的玫瑰花蕊摘下。在上课前后，也轻易不同男同学交谈。他们似乎也很腼腆。一般上课时我们都安静地坐在第一排，但当坐在我们后面的男同学，把脚放在我们椅子下面的横杠上，簌簌抖动的时候，我们就使劲地把椅子往前一拉，他们的脚就忽然砰的一声砸到地上。我们自然没有回头，但都忍住笑，也不知道他们伸出舌头笑了没有？

但是我们几个在全校的学生会里有职务的人，都不免常和男生接触，如校刊编辑部、班会等。我们常常开会，那时女校还有“监护人”制度，无论是白天或晚上，几个人或几十个人，我们的会场座后，总会有一位老师，多半是女教师，她自己拿着一本书在静静地看。这一切，连老师带学生都觉得又无聊，又可笑！

我是不怕男孩子的！自小同表哥哥、堂哥哥们同在惯了，每次吵嘴打架都是我得了“最后胜利”，回到家里，往往有我弟弟们的同学十几个男孩子围着我转。只是我的女同学们都很谦退，我也不敢“冒尖”，但是后来熟了以后，男同学们当面都说我“利害”，说这些话的，就是许地山、瞿世英（菊农）、熊佛西这些人，他们同我后来也成了好朋友。

这时我在燕大女校“学生自治会”里，任务也多

得很！自治会里有许多委员会——甚至有伙食委员会！因为我没有住校，自然不会叫我参加，但是其他的委员会，我就都被派上了！那时我们最热心的就是做社会福利工作，而每兴办一项福利工作，都得“自治会”自己筹款。最方便而容易的，就是演戏卖票！我记得我们演过许多“莎士比亚”的戏，如《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等等，那时我们英文班里正读着“莎士比亚”，美国女老师们都十分热心地帮助我们排练，设计服装、道具等等，我们演得也很认真卖力，记得有一次鲁迅先生和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来看过我们的戏——忘了是哪一出——鲁迅先生写过文章说爱罗先珂先生说我们演的比当时北京大学的某一出戏好得多。因此他和北大同学还引起了一番争论，北大同学说爱罗先珂先生是个盲人，怎能“看”出戏的好坏？我和鲁迅先生只谈过一次话，还是很短的，因为我负责请名人演讲，我记得请过鲁迅先生、胡适先生，还有吴贻芳先生……我主持演讲会，向听众同学介绍了主讲人以后，就只坐在讲台上听讲了——我和鲁迅先生的接触，就这么一次，我也不知道鲁迅先生是从哪一位同学手里买到戏票的。

这次演剧筹款似乎是我们为学校附近佟府夹道的不识字的妇女们，义务开办一个“注音字母”学习班。自治会派我去当校长。我自己就没有学过注音

字母，但是被委为校长，就意味着把找“校舍”——其实就是租用街道上一间空屋——招生、请老师——也就是请一个会教注音字母的同学——都由我包办下来。这一切，居然都很顺利。开学那一天，我去“训话”，看到讲台前坐的都是中年妇女，只前排右首坐着—一个十分聪明俊俏的姑娘。听课—后我过去和她搭话，她说：“我叫佟志云，十八岁，我识得字，只不过也想学学注音字母。”我想她可能是佟王后裔。她问我：“校长，您多大年纪了？”我笑着说“反正比你大几岁！”

这时燕大女校已经和美国威尔斯利（Wellesley College）女子大学结成“姐妹学校”。我们女校里有好几位教师，都是威校的毕业生。忘了是哪一年，总在二十年代初期吧，威校的女校长来到我们校里访问，住了几天，受到盛大的欢迎。有一天她——我忘了她的名字——忽然提出要看看古老北京的婚礼仪式，女校主任就让学生们表演一次，给她开开眼。这事自然又落到我们自治会委员身上，除了不坐轿子以外，其他服装如凤冠霞帔、靴子、马褂之类，也都很容易地借来了，只是在演员的分配上，谁都不肯当新娘。我又是主管这个任务的人，我就急了，我说“这又不是真的，只是逢场做戏而已。你们都不当，我也不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就当了！”于是我

扮演了新娘。凌淑浩——凌叔华的妹妹，当了新郎。送新太太是陈克俊和谢兰蕙。扮演公公婆婆的是一位张大姐和一位李大姐，都是高班的学生，至今我还记得她们的面庞。她们以后在演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的童话剧《青鸟》中，还是当了我的爷爷和奶奶，可是她们的名字，我苦忆了半天也想不起来！

那夜在女校教职员宿舍院里，大大热闹了一阵，又放鞭炮，又奏鼓乐。我们磕了不少的头！演到坐床撒帐的时候，我和淑浩在帐子里面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急得克俊和兰蕙直捂着我们的嘴！

我演的这些戏中，我最喜欢的还是《青鸟》，剧本是我从英文译的，演员也是我挑的，还到培元女子小学，请了几个小学生，都是我在西山夏令会里认识的小朋友。我在《关于女人》那本书内写的“我的同学”里，就写了和陈克俊在“光明宫”对话的那一段。这出剧里还有一只小狗，我就把我家养的北京长毛狗“狮子”也带上台了。我的小小弟弟冰季，还怕我们会把“狮子”用绳子拴起，他就亲自跟来，抱着它悄悄地在后台坐着，等到它被放到台上，看见了我，它就高兴得围着我又蹦又跳，引得台下一片笑声。

总之，我的大学生涯是够忙碌热闹的，但我却没有因此而耽误了学习和写作。我的老师们对我都很好，尤其是我的英文老师鲍贵思 (Grace Bognton) 在

我毕业的那一年春季，她就对我说威尔斯利女大已决定给我两年的奖学金——就是每年八百美金的学、宿、膳费，让我读硕士学位——她自己就是威尔斯利的毕业生，她的母亲和她的几个妹妹也都是毕业于威校，可算是威校世家了——她对于母校感情很深，盛赞校园之美、校风之好，问我想不想去，我当然愿意。但我想一去两年，不知这两年之中，我的体弱多病的母亲，会不会出什么意外？我对家里什么人没有讲过我的忧虑，只悄悄地问过我们最熟悉的医生孙彦科大夫，他是我小舅舅杨子玉先生的挚友，小舅舅介绍他来给母亲看过病。后来因为孙大夫每次到别处出诊路过我家，也必进来探望，我们熟极了。他称我父亲为“三哥”，母亲为“三嫂”，有时只有我们孩子们在家，他也坐下和我们说笑。我问他我母亲身体不好、我能否离家两年之久？他笑了说“当然可以，你母亲的身体不算太坏，凡事有我负责”。同时鲍女士还给我父亲写了信，问他让不让我去？父亲很客气地回了她一封信，说只要她认为我不会辜负她母校的栽培，他是同意我去美国的。这一切当时我还不好意思向同学们公开，依旧忙我的课外社会福利工作。

那几年也是家庭中多事之秋，记得就是在我上中学的末一年（？），我的舅舅杨子敬先生逝世了。他

是我母亲唯一的亲哥哥。兄妹二人感情极好。我父亲被召到北京来时，母亲也请舅舅来京教我的三个弟弟，作为家庭教师。不过舅舅没有和我们住在一起，他们住在离中剪子巷不远的铁狮子胡同。忽然有一天早晨，舅家的白妈，气急败坏地来对我母亲说，从昨天下午起舅舅肚子痛得利害，呕吐了一夜，现在已经不能说话了。我想这病可能是急性盲肠炎。——那时父亲正不在家，他回到福州，去庆祝祖父的八十大寿了。——等母亲和我们赶到时，舅舅已经断气了。这事故真像晴天霹雳一般，我们都哭得泪干声咽！母亲还能勉强镇定地办着后事，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死人入殓！我的大弟弟为涵，还悄悄地对我说“装舅舅的那个大匣子，靠头那一边，最好开一个窟窿，省得他在那里头出不了气。”我哭得更伤心了，我说“他要是还能喘气，就不用装进棺材里去了！”

记得父亲回福州的时候，我还写了几首祝贺祖父大寿的诗，请他带回去，现在只记得一首：

浮踪万里客幽燕
恰值太公八秩年
自笑菲才惭咏絮
也裁诗句谱新篇

反正都是歪诗，写出来以助一笑。

等到父亲从福州回来，舅母和表弟妹们已搬进我家的三间西厢房，从前舅舅教弟弟们读书的屋子里。从此弟弟也都进入了小学校。

此后，大约是我在大学的时期，福州家里忽然来了一封电报说是祖父逝世了，这对我们又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我父亲星夜奔丧，我忽然记起在一九一二年我离开故乡的时候，祖父曾悄悄地将他写的几副自挽联句，交给我收着，说“谁也不让看，将来有用时，再拿出来”。我真的就严密地收起，连父母亲都不知道。这时我才拿出来交给父亲带回，这挽联有好几对。有一联大意是说他死后不要僧道啐经，因为他不信神道，而且相信自己生平也没有造过什么冤孽，怎么写的我不记得了。有一联我却记得很清楚，是：

有子万事足，有子有孙又有曾孙，足，足，
足；

无官一身轻，无官无累更无债累，轻，轻，
轻。

父亲办完丧事，回来和我们说：祖父真可算是“无疾而终”。那一天是清明，他还带着伯叔父和堂兄们步行到城外去扫墓，但当他向坟台上捧献祭品时，

双手忽然颤抖起来，二伯父赶紧上前接过去。跪拜行礼时也还镇定自如，回来也坚持不坐轿子，说是走着好。回到家后，他说似乎觉得累了一点，要安静躺一会子，他自己上了床，脸向里躺下，叫大家都出去。过不了一会，伯父们悄悄进去看时祖父已经没有呼吸了，脸上还带着安静的微笑！我记得他的终年是八十六岁。

这时已是一九二三年的春季，我该忙我的毕业论文了。文科里的中国文学老师是周作人先生。他给我们讲现代文学，有时还讲到我的小诗和散文，我也只低头听着，课外他也从来没有同我谈过话。这时因为必需写毕业论文，我想自己对元代戏曲很不熟悉，正好趁着写论文机会，读些戏曲和参考书。我把论文题目《元代的戏曲》和文章大纲，拿去给周先生审阅。他一字没改就退回给我，说“你就写吧”。于是在同班们几乎都已交出论文之后，我才匆匆忙忙地把毕业论文交了上去。

就在这时我的吐血的病又发作了。我母亲也有这个病，每当身体累了或是心绪不好，她就会吐血。我这次的病不消说，是我即将离家的留恋之情的表现。老师们和父母都十分着急，带我到协和医院去检查。结果从透视和其他方面，都找不出有肺病的症状。医生断定是肺气枝涨大，不算什么大病症。那时

我的考上协和医学院的同学们和林巧稚大夫——她也还是学生，都半开玩笑地和我说：“这是天才病！不要胡思乱想，心绪稳定下来就好。”

于是我一面预备行装，一面结束学业。在毕业典礼台上，我除了得到一张学士文凭之外，还意外地得到了一把荣誉奖的金钥匙。

这一年的八月三日，我离开北京到上海准备去美。临行以前，我的弟弟们和他们的小朋友们，再三要求我常给他们写信，我答应了。这就是我写那本《寄小读者》的“灵感”！

八月十七日，美国邮船杰克逊总统号就把带着满腔离愁的我，从“可爱的海棠叶形的祖国”载走了！我写过一首诗：

她是翩翩的乳燕，
横海飘游，
月明风紧，
不敢停留——
在她频频回顾的
飞翔里
总带着乡愁！

我在国内的大学生涯，从此结束。在我的短文

里，写得最少的，就是这一段，而在我的回忆中，最惬意的也就是这一段，提起笔来，就说个没完了！

1985年3月18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收获》1985年第4期。）

我为什么翻译 《先知》和《吉檀迦利》

我只懂一门外文——英文，还不精通。因此轻易不敢作翻译工作，尤其译诗。我虽然也译过一两本国王和总统的诗，那都是“上头”给我的任务，我只好努力而为。至于我自喜爱，而又极愿和读者共同享受，而翻译出来的书，只有两本，那就是《先知》和《吉檀迦利》！

一九三〇年母亲逝世之后，我病了一场，病榻无聊，把从前爱读的、黎巴嫩诗人纪伯伦写的散文诗《先知》重读一遍，纪伯伦从小饱经忧患，到处飘流，最后在美国定居，他用亚刺伯文写了许多作品，都已被译成十八种各国文字。以后他又用英文写了许多作品，而这本《先知》是被世界的读者们称之为他的代表作的。

我那时觉得有喷溢的欲望，愿意让不会读原文的读者，也能享受我读这本书时的欣悦、景仰和伤

感。

《先知》的好处，是作者以纯洁美丽的诗的语言，说出了境界高超、眼光远大的、既深奥又平凡的处世为人的道理。译来觉得又容易又顺利，又往往会不由自主地落下了眼泪。

一九五五年，我又译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献诗”——《吉檀迦利》。大异于纪伯伦的身世，泰戈尔是诞生于“歌鸟之巢”的“王子”，从他欢乐的心境中，他热爱了周围的一切。他用使人目眩心摇的绚烂美丽的诗的语言，来歌唱他所热爱的大自然和人类。为了要尽情传达出作者这“歌鸟”般的飞跃鸣啾的心情，使译者在中国的诗歌词汇的丛林中，奔走了好长的道路！

我从来不敢重译，但是这两位诗人的这两本书，都是诗人自己用英文写的。我知道我的译文，只能汲取了大海中的一滴，但只此一滴，我也愿贡献给不会读原文的读者们，来分享我译诗时的“辛苦”和享受。

1985年3月20日

“由岑散文”序

大概是一九七九年以前的一天，赵朴初同志带了一位聪明俊俏的小姑娘来看我。说她是他好友的女儿，名叫由岑，很喜欢写作。朴初同志从来没有给我介绍过年轻朋友，我想这位年轻人一定才具不凡，但那一天我们的对话并不多，我和赵朴初同志谈天，她只在一旁很腼腆地听着。一九七九年以后，她担任了《儿童文学》的编辑，常同编辑部里的同志来看我，我发现她说话很有见地。大概是一两年以前吧，她忽然抱了一大信函的她在许多刊物上发表过长短短短的文章来，要我给这个散文集作序。我看了此文章，才知道她是生于我曾住过两年的山明水秀、四季如春的云南昆明，而且出生于书香家庭，人杰地灵，这就使得她笔下出来的东西，思想高尚而健康，文字清新而绚丽，她写了山水，如华山、黄河……她写了人物如刘胡兰、王立山、小菲菲等，还有我和她共同敬佩的赵朴初诗人，都能饱满地写出她自己心中亲切

的感受。

写吧，多写吧！你年华正茂，文思正涌，就以你这般健康快乐的情绪来写我们国家大好的现在和未来吧。我这些年来，足不出户、力不从心，有时不免也有些阴郁和消沉，青春是多么应该珍惜的东西！“花开堪折直须折”，希望你在未来的岁月中，再好好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再写些比现在写的更凝炼、炉火更青的散文来！

1985年3月20日 急就

从联句又想到集句

记得几年前在柳无非同志家里，看到柳亚子老先生写的一副集龚的对联，是：

一寸春心红到死
四厢花影怒于潮

猛忆起我在中学时代，也有一阵子沉迷于集龚，龚定庵先生学问渊博，他的文章有许多是我看不懂的，但是他的诗词，我还可以领会一二。最妙的是，光是他的《己亥杂诗》，已有三百十五首，那就是有了一千二百六十句七言句，再加上其他诗词，数目就更多。这就如同我手边有好几百块五色缤纷大大小小的积木，可以堆成小巧玲珑的亭台，也可以搭成七宝庄严的楼阁！当时随手记下的都已不存了！现在想起来，还有几首不忘的。比如对联：

别有狂言谢时望
更何方法遣今生

又如：

烈士暮年宜学道
才人老去例选禅

集的诗有：“偶赋凌云偶倦飞，一灯慧命续如丝。百年心绪归平淡，暮气颓唐不自知”。“风云材略已消磨，其奈尊前百感何。吟到恩仇心事涌，侧身天地我蹉跎”。“光影犹存急网罗，江湖侠骨恐无多。夕阳忽下中原去，红豆年年掷逝波。”“不容水部赋清愁，大宙南东久寂寥。且莫空山听雨去，四厢花影怒于潮。”也有些艳句，如：“三生花草梦苏州，红似相思绿似愁。今日不挥闲涕泪，一身孤注掷温柔。”

这些感慨和情绪，都不是我当时心中脑中所有的！只为集起来，读来顺口，看来顺理，也不管它走韵不走韵，随时写好便寄去给我的“小长辈”看，如我的“小”舅舅杨子玉先生，我的“老”表兄刘放园先生，他们只比我大十七八岁，以博一笑。但是其中有一联句就觉得还朴素平稳，也合乎我当时的心境，于是在一九二四年从美国的沙穰疗养院寄回中国给

刘放园表兄，请他写成一副对联，我好悬挂，那就是：
世事沧桑心事定
胸中海岳梦中飞

不料他却请梁任公先生代笔！那时我还不认识梁先生。

这副对联，我一直挂在我的案头或床头，从北京到重庆到日本又回到北京！幸而这次回来，这副对联却一直压在一只大书箱的底下，居然因此逃过十年浩劫！我案头、墙上的郭沫若、茅盾、老舍以及其他朋友的字，那时却都被整掉了。

如今这一副对联，依旧挂在我的小客厅墙上，朋友们来看了，都很欣赏。不容易呵，那是六十年前的“乙丑”写的，今年又是“乙丑”！

1985 年 3 月 22 日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85 年 5 月 10 日。）

致 葛 翠 琳

翠琳：

你寄我的香港山边社的三本书已收到了，《美的形容》和《冰心》两本。我又躺了三个星期，因不慎摔了一交。小妹比我还忙，收条我自己写了。匆上。

冰 心

四、三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霞

四十年代初期，我在重庆郊外歌乐山闲居的时候，曾看到英文《读者文摘》上，有个很使我惊心的句子，是：

May there be enough clouds in your life to make a beautiful sunset.

我在一篇短文里曾把它译成：“愿你的生命中有够多的云翳，来造成一个美丽的黄昏。”

其实，这个 sunset 应当译成“落照”或“落霞”。

霞，是我的老朋友了！我童年在海边、在山上，她是最熟悉最美丽的小伙伴。她每早每晚都在光明中和我说：“早上好”或“明天见”。但我直到几十年以后，才体会到：云彩更多，霞光才愈美丽。从云翳中外露的霞光，才是璀璨多彩的。

生命中不是只有快乐，也不是只有痛苦，快乐和痛苦是相生相成，互相衬托的。

快乐是一抹微云，痛苦是压城的乌云，这不同的

云彩，在你生命的天边重叠着，在“夕阳无限好”的时候，就给你造成一个美丽的黄昏。

一个生命到了“只是近黄昏”的时节，落霞也许会使人留恋，惆怅。但人类的生命是永不止息的。地球不停地绕着太阳自转。

东方不亮西方亮，我窗前的晚霞，正向美国东岸的慰冰湖上走去……

（本篇最初发表于万叶散文丛刊第三辑《霞》，人民日报出版社 1986 年 9 月初版。）

致 宫 玺

宫玺同志：

知“四集”又将付印，真是太难为你了！《张天翼文集》二本收到（他已作古，家里人没让我知道），我从报上看见的。他久病又不能说话，我认为这样倒也痛快！我也是行动不便，动辄出事，老了真没意思！“好汉不提当年勇”。祝好。

冰 心

五、四

写给民进女会友、女老师的一封信

亲爱的民进女会友，中小学的老师们：

我因为行动不便，已有四年没有参加民进的各种集会了，但是就没有一天不想到你们！中小学的教师同志们，你们是我们中国二亿幼苗的园丁，你们三个面向——面向四个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最关键、最重要的支持和促进的人！

我听说现在有几个机关共同主办的“我的老师”的征文，几天之内，就收到几万篇小学生的文章。我就更知道老师的一句话比做父母的十句话还灵。今天就要向你们请求一件事，就是要求你们：要中小学的孩子们，切切实实地做一个“文明的北京人”或“文明的中国人”！

这几天正是春游时节。我自己已是出不去了，但我知道有许许多多中小学的学生，正在兴高采烈地到郊外名胜之地去春游。我愿意他们在老师们的带领之下，个个都有文明习惯，不随地吐痰，不随地抛

掷糖纸、果核或其它东西。

我永远也忘不了，早在一九三六年，我到欧洲旅游的时候，一位德国朋友在星期天带我们到柏林郊外一处树林里去野餐，那片树林一望无际。那天总有好几千个家庭或团体，在草地上铺上布，一群人饮、食、笑、乐，十分热闹。我的德国朋友对我说，每星期天几乎都有十万人在此野餐，但野餐过了，十万人散了，草地上却是干干净净，连一块纸片都没有！我从心底佩服德国人的文明习惯！

在国内呢，越是名胜之地，游人越多的地方，就越是肮脏杂乱。解放后是好多了。但昨天，我的女儿和她的同事们去香山鹫峰，也算是春游吧。回来就问她，鹫峰游人多不多？干净吗？她摇头说不干净，糖纸、果核不用说了，还有些打碎的啤酒瓶、塑料杯子等等，扔得到处都是！扔这些东西的人，大都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少年，临走还在山壁上留下大名“×××到此一游”！

在现在政府大讲精神和物质文明的时候，我觉得污染环境比随地吐痰更应当重重处罚！

我在《三寄小读者·通讯二》中曾给小朋友们写过讲这番道理的信。我请求民进的女老师们把这篇通讯作为课外读物给学生们重看一遍，好吗？

顺请

教安

你们热情的会友 冰 心

1985年5月5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民进妇女》1985年第2期。)

关于男人（之三）

四 我的老师——管叶羽先生

我这一辈子，从国内的私塾起、到国外的大学研究院，教过我的男、女、中、西教师，总有上百位！但是最使我尊敬爱戴的就是管叶羽老师。

管老师是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教数、理、化的老师，（一九二四年起，他又当了我的母校贝满女子中学的第一位中国人校长，可是那时我已经升入燕京大学了。）一九一八年，我从贝满女中毕业，升入协和女子大学的理预科，我的主要功课，都是管老师教的。

回顾我做学生的二十八年中，我所接触过的老师，不论是教过我或是没教过我的，若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教育服务”以及“忠诚于教育事业”的严格标准来衡量我的老师的话，我看只有管叶羽老师是当之无愧的！

我记得我入大学预科，第一天上化学课，我们都坐定了，（我总要坐在第一排）管老师从从容容地走进课室来，一件整洁的浅蓝布长褂，仪容是那样严肃而又慈祥，我立刻感到他既是一位严师，又像一位慈父！

在我上他的课的两年中，他的衣履一贯地是那样整洁而朴素，他的仪容是一贯地严肃而慈祥。他对学生的要求是极其严格的，对于自己的教课准备，也极其认真。因为我们一到课室，就看到今天该做的试验的材料和仪器，都早已整整齐齐地摆在试验桌上。我们有时特意在上课铃响以前，跑到教室去，就看见管老师自己在课室里忙碌着。

管老师给我们上课，永远是启发式的，他总让我们预先读一遍下一堂该学的课，每人记下自己不懂的问题来，一上课就提出大家讨论，再请老师讲解，然后再做试验。课后管老师总要我们整理好仪器，洗好试管，擦好桌椅，关好门窗，把一切弄得整整齐齐地，才离开教室。

理预科同学中从贝满女子中学升上来的似乎只有我一个，其他的同学都是从华北各地的教会女子中学来的，她们大概从高中毕业后都教过几年书，我在她们中间，显得特别的小（那年我还不满十八岁），也似乎比她们“淘气”，但我总是用心听讲，一字不

漏地写笔记，回答问题也很少差错，做试验也从不拖泥带水，管老师对我的印象似乎不错。

我记得有一次做化学试验，有一位同学不知怎么把一个当中插着一根玻璃管的橡皮塞子，捅进了试管，捅得很深，玻璃管拔出来了，橡皮塞子却没有跟着拔出，于是大家都走过来帮着想。有人主张用钩子去钩，但是又不能把钩子伸进这橡皮塞子的小圆孔里去。管老师也走过来看了半天……我想了一想，忽然跑了出去，从扫院子的大竹扫帚上拗了一段比试管口略短一些的竹枝，中间拴了一段麻绳，然后把竹枝和麻绳都直着穿进橡皮塞子孔里，一拉麻绳，那根竹枝自然而然地就横在皮塞子下面。我同那位同学，一个人握住试管，一个人使劲拉那根麻绳，一下子就把橡皮塞子拉出来了。我十分高兴地叫：“管老师——出来了！”这时同学们都愕然地望着管老师，又瞪着我，轻轻地说：“你怎么能说管老师出来了！”我才醒悟过来，不好意思地回头看着站在我身后的管老师，他老人家依然是用慈祥的目光看着我，而且满脸是笑！我的失言，并没有受到斥责！

一九二四年，他当了贝满女中的校长，那时我已经出国留学了。一九二六年，我回燕大教书，从升入燕大的贝满同学口中，听到的管校长以校为家，关怀学生，胜过自己的子女的嘉言懿行，真是洋洋盈耳，

他是我们同学大家的榜样！

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了，那时我想去看看战后的日本，却又不想多呆。我就把儿子吴宗生（现名吴平）、大女儿吴宗远（现名吴冰）带回北京上学，寄居在我大弟妇家里。我把宗生送进灯市口育英中学，（那是我弟弟们的母校）把十一岁的大女儿宗远送到我的母校贝满中学，当我带她去报名的时候，特别去看了管校长，他高兴得紧紧握住我的手——这是我们第一次握手！他老人家是显老了，三四十年的久别，敌后办学的辛苦和委屈，都刻画在他的面庞和双鬓上！还没容我开口，他就高兴地说“你回来了！这是你的女儿吧？她也想进贝满？”又没等我回答，他抚着宗远的肩膀说“你妈妈可是个好学生，成绩还都在图书馆里，你要认真向她学习。”哽塞在我喉头的对管老师感恩戴德的千言万语，我也忘记了到底说出了几句，至今还闪烁在我眼前的，却是我落在我女儿发上的几滴晶莹的眼泪。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清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作家》1985年第5期。）

介绍《今夜月色好》

《文艺报》来信，问我现在正在读什么书？我现在行动不便，从不出门，整天除了看书，还是看书。每天邮差来时，我都会收到好些刊物：文艺刊物，妇女刊物，儿童刊物……拆得我手腕酸疼，看得我眼花缭乱！但是，实话说，能引我重读一遍的文章并不多。

只是前天看了《人民文学》今年第五期彭荆风同志的《今夜月色好》却使我喜欢，兴奋。我刚看到胡耀邦同志讲的话，说我们的文艺应当振奋人民的爱国精神，我愿我的朋友都去找来读一遍。讲的是一位道班房的班长和他的新婚不久的妻子，住在终年云雾深锁的一座大山里，过着甜蜜的生活。但这大山里不只有他们两个。还有道班房的小伙子们，有战士，有参谋……主人公却是那位新娘，山中唯一的女性。这些人在一起，真是互助相亲，那里的生活用部队的话说，就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故事里有大风雨，有严重的塌方，有隆隆的炮车，有炮战的阵

地。在炮火纷飞之中，我们的主人公眼里看到的是：“一切都在闪闪发光”的帐篷、大炮、战士的钢盔，以及炮战后她的倒塌的道班房子……一切都显得“清爽”而“明净”、“她觉得今夜月色真好！”

我不认识这位作者。遗憾的是卷头“编者的话”里，也没有提到这篇小说。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艺报》1985年8月10日。）

致海外朋友和同胞

我刚刚写了上面的几个字，我的回忆和爱感，就像一阵从平静的海面卷来的潮水，碰到海滩上大大小小的“往事”的礁石，忽然喷涌起灿烂的很高的浪花！

我这一生中，在海外的许多国家学习过、居住过、访问过……这世界上，几乎到处都有我魂牵梦萦的人物和山水，每一想起，就像有一张张亲切美丽的画片，移过我的眼前，我想写的真有千言万语！但这封信不是写给某一个人的，叫我从哪里下笔呢？

首先，我要告诉你们我的近况。我比从前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身体上是老一些了，而心理上却是年轻了许多，生活上也安乐了许多。我的国家，近几年来真是“政通人和”。我们对我们的领导人都很佩服满意。因为他们大多数都很像个“公仆”，而不像个

“长官”。在他们的领导下，十亿人民共同努力，占人民总数十分之八的农民富裕起来了，我们知识分子，妇女和儿童被重视起来了，我们广大国土上的能源被开发出来了，等等，当然，比起发达的国家，我们的生活水平还有一段差距，但我一生中第一次看到大家是这样地乐观而振奋！

说到我自己，一九八〇年自日本访问归来以后，不久就患了脑血栓，以后又患右腿骨折，从此就足不出户。最使我难过的是错过了许多次出国访问、和你们重逢的机会！但我的海外的朋友和同胞每次来到北京，都必带纪念品来看我。这使我感动得直流泪。但也因为常常会客，而受到医生的警告！

我仍希望我的海外朋友和同胞常到中国来看看，不是看我，而是看中国近年来的变化，以及我们生活和劳动的情况，有什么应该改进的地方，请你们不客气地指出。我希望我们大家有更频繁的来往，更深刻的了解，更深厚的同情。因为促进人类进步，维持世界和平，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使命！我们不是常谈到这个题目么？

最后，请允许我利用人民日报海外版一个小小的篇幅，来祝愿我的海外朋友和同胞们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你们热诚的朋友 冰 心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海外版》1985年7月2日。)

梁实秋《忆故知》序

梁实秋先生的散文集《雅舍怀旧——忆故知》，将在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请我作序。我先看了这本集子的目录，真是感慨无尽！

实秋是我的老伴吴文藻的同班，我们是相识几十年的老友了。一九二三年我们乘同一条远洋轮船到美国留学，乘客几乎都是中国学生，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就有一百多人，我们燕京大学去的就有许地山、陶玲和我，还有一位姓李的男同学，名字我忘记了。此外还有些自费出国的。船在太平洋上走了两个星期，我们大都互相认识了。我记得我们燕大的许地山和清华学校的梁实秋等几个爱好文学的人，办了一个墙报，名叫《海啸》。我也在上面写了几首短诗。

我到了美国，就进波士顿附近的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研究院。过了一年吧，梁实秋也到了波士顿的哈佛大学。波士顿是美国文化中心，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名牌大学，都有不少的中国男女留学生，

我们常在一块聚会。回国以后，我一直在燕京大学教学，实秋却在山东青岛，不过我们还不时通信。但有一件事，我记得很真，就是一九二九年的秋天，实秋同闻一多来到我同吴文藻结婚后的燕大燕南园的新居，他们在楼上楼下走了一遍，在客厅里坐着喝茶，忽然两人同时站起，笑着说：“我们出去一会儿就来。”说着他们就走了，我们以为他们是去看在燕大的其他朋友，并没有在意。不料不久他们就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包香烟，笑说“你们这里什么都好，就缺少一件待客最好的东西。”说着他们就打开包，每人用打火机点燃了一支，一面把那包烟甩在茶几上，笑说“给你们留下一个备忘录，以后千万不要忘了拿烟待客！”虽然我和文藻都不吸烟，但从此不缺待客的香烟。

抗战以后，我们都到了重庆，但我们住在歌乐山，他住在北碚，虽然也有往来，但不常在一起。抗战胜利后，我们先去了日本，又回到大陆。实秋却到了台湾，隔海相望，四十年了，没有通过消息！这次从他的《忆冰心》这篇散文里知道他以为我们死了，还写过追悼文章！我感激故人对我们的眷恋，我没有去过台湾，无从想象台湾的生活情况，但北京的情况呢，纸上真是说不完，我希望实秋回来看看，看看我们两人的实际生活，看看他自己的儿女和我们的儿

女工作和生活的精神面貌。北京是大变样了，但他爱吃的东西，依然可以吃到，他玩过的或没玩的地方都是更更好了。总之，百闻不如一见，眼见为实，我们都是八十以上的人了，回来畅谈畅游一下，如何，我们和你的儿女们都在等你！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艺报》1985年7月13日。）

致王安忆^①

安忆同志：

你的信我早收到了，因为到医院检查，耽误了。你让我作序，我感到荣幸。只是你出了五本书，我只有一本，还有你提到的几篇小说，大概我都没看过，能否寄来我看？《小鲍庄》是在《中国作家》上，我已看过！（你寄的仍未到）还有，我的住址你写的是我的旧居，新址在信封上。请问你妈妈好。

冰 心

六月十九日

（此信系周达宝同志征集。）

^① 王安忆，女作家。1954 年生于南京，祖籍福建同安。1955 年随母亲茹志鹃迁上海。曾任《儿童时代》杂志编辑，现为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专业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集《雨，沙沙沙》、《流逝》、《小鲍庄》；长篇小说《黄河故道人》等。

《陈伯吹传》序

我和陈伯吹先生相识，大概总在五十年代以后了。我记得在一九五二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以后，每次有关于儿童文学的聚会或座谈会，我总可以见到他。那时他似乎住在北京，也常到我家里来，后来他就迁居上海，不过每次来京，必有电话问讯。他是一位恂恂长者，虚怀若谷，他写过、译过许多作品，都是关于小孩子的，用的都是儿童都能理解接受的文学语言，浅显、细腻、活泼，足见他是深入到过孩子群中，在这点上我自叹弗如！

因为每次相见，总是在会场席上，没有深谈，这次读了苏叔迁同志撰写的这本《陈伯吹传》底稿，才知道他在那么一条坎坷不平的生命路上，还那么努力深入八十年代的少年儿童的生活，用文学形式来培育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在此，我向他献上羡慕和敬礼！

冰 心

1985 年 6 月 23 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艺报》1986 年 1 月 5 日。《陈伯吹传》，未来出版社 1987 年 4 月初版。）

致李小林^①

最亲爱的小林：

真是说不尽多么想你和你爸爸及一家人，人老了什么病都有，也不容易治。校样改好寄上，《收获》校对还真不错！北京就不行，你看《中国作家》错的真不成话，爸书已理完了，真该好好休息，不要再折腾了。我只吩咐卓如等人，我死后，凡是有上下款的书和人送我的字画和小孩的信（总有几千封），都交巴金资料馆！其余的孩子们挑剩的，交民进图书馆，我的英文书十年动乱中早收民院图书馆。不写了，以后如再有自传还是给你们。

二姐忙的起劲着呢，青春多么可贵，大姐广东招生去了，十天可回。

亲亲你

姑 姑

七、一

① 李小林，著名作家巴金的女儿，现为《收获》杂志副主编。

致 宫 玺

宫玺同志：

信悉。（蒋光慈书收入，谢谢！）知您去玩了些地方，我真羡慕。近来身体不太好，懒得出去，也出不去。上海作协由茹志鹃主持，太好了，我很喜爱她们母女，请代问好。祝健！

冰 心

七、六

致 王 安 忆

安忆同志：

你每次寄书如《十月》，校样及小说月报都收到无误。等你那八篇的稿子收齐后，即替你写序，不看完全，很难下笔。你说赴美后思想有冲击和变化，能言其详否？作品中还看不出。

冰 心

七、十三

（此信系周达宝同志征集。）

《应当尊敬的人》序

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会员，大多数是教育工作者。他们中间涌现出一大批荣获特级教师、“五讲四美为人师表”先进教师等光荣称号的教师。这本《应当尊敬的人》就是这些先进教师事迹的汇集。

从我自己的人生经验中，除了父母之外，一生自幼至老，在学识的成长上、人格的修养上，都是受益于老师们的教诲。时至今日，每逢在生活中有情绪上的波动或工作上的挫折，我总能从回忆中的某一位老师的充满慈爱的教诲中，得到安慰和鼓励！我深深地感到爱是教育的基础。爱祖国、爱人民、爱人类的未来，对这一切的爱是老师们教育力量的源泉。当老师们以爱的心血，浇灌在祖国大地上，普遍地开出促进四化人材的灿烂花朵的时候，让我们都来重读这本《应当尊敬的人》，以此向老师们献上衷心的敬意！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编的《应当尊敬的人》，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1986 年 8 月出版。）

致 巴 金

巴金老弟：

收到你蝇头小楷的信，十分高兴。我和你一样，杂事太多，客人也不少，该写的都没有写出，也在混日子！北京这几天热得利害，我想上海也够瞧的。吴冰前天去了兰州，是公事，要二十天。吴青（她已给小林寄信，我们常念道你）今天去了承德，三天，是游玩。我和文藻（他问你好）哪也去不了，只好在家吹风扇。我们都没想到能活这么长，他还在带研究生。我的东西已决定都交资料馆，你知道了。这几个字告诉你我很想你和小林！

前天去医院检查，结果还好。带了花由吴青的孩子送给叶老，他仍在医院，已有几个月了，天热，还是在医院有冷气。

冰 心

七、廿二

致王安忆

安忆同志：

你的七月十六日长信收到。你寄来的信和书我都已收入，只是你托北京朋友寄的书还未到。也许我不必看完你要出的那本集子中的十篇，我就可以写序，看完全了，当然更好，就是要耽搁时候。那本集子叫什么名字？

你的长信，帮助我了解一些问题，但从你的作品中，我知道的更多。序只是说明我个人对你的欣赏和了解，现在就可以写出，反正你集中的小说，还有未出版的，等等也无妨。北京这几天热极了，上海也够瞧的？问你母亲好。

冰 心

七、廿二

（此信系周达宝同志征集。）

致 李 準^①

李準同志：

昨得你的“铁哥们”舒立的信，谈你得了脑血栓，轻度偏瘫。让我写信劝你不要急躁，这任务，我定能胜任愉快的。我是1980年从日本访问回来后，因赶译那一本马尔他总统的诗《燃灯者》，忽然犯了脑血栓，也是轻度偏瘫。我一辈子没有什么长处，若有的话，就是：善于与医生合作而且从不悲观。因为，我从小多病（《寄小读者》就是病中的作品）什么吐血等等，我都抗过去了。我吐了几十年的血，到58年，忽然又吐了，末一次是在伦敦访问时，我患脑血栓那年，已八十岁了，以后又患骨折，行动不便。从那时

^① 李準，作家。1928年5月17日生。祖上蒙族，姓木华梨，后简改为李，河南孟津人，幼年生活在农村。1953年发表小说《不能走那条路》，1955年调入河南省文联开始从事专业创作。主要作品有《李双双小传》、《孟广泰老头》、《耕云记》；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电影文学剧本《老兵新传》、《龙马精神》、《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等。

起，我就谢绝一切社会活动，只在家休息，但不废写作。你那么年轻，要以我为鉴，向我学习，与医生合作，不要悲观，这病不是太重要的，只为你没有病过，没有耐性，因此自寻烦恼。

振奋起来吧，我不信堂堂男子汉，和疾病斗争的精神，反不如我这个老太太。

祝你早日康复！

冰 心

1985、7、23。

（此信系周达宝同志征集。）

关于男人（之四）

五 我的表兄们

中国人的亲戚真多！除了堂兄弟姐妹，还有许许多多的表兄弟姐妹。正如俗语说的：“一表三千里。”姑表、舅表、姨表；还有表伯、表叔、表姑、表姨的儿子，比我大的，就都是我的表兄了；其中有许多可写的，但是我最敬重的，是刘道铿（放园）先生。他是我母亲的表侄，怎么“表”法，我也说不清楚，他应该叫我母亲“表姑”，但他总是叫“姑”，把“表”字去掉。据我母亲说是他们从小在一个院住，因此彼此很亲热。从民国初年，我们到北京后，每逢年节或我父母亲的生日，他们一家必来拜贺。他比我大十七岁，我总以长辈相待，捧过茶烟，打过招呼，就退到一边，带他的儿女玩去了。那时他是《晨报》的编辑，我们家的一份《晨报》就是他赠阅的。“五四”运动时，我是协和女大学生会的文书，要写些宣传的文

章，学生会还让我自己去找报刊发表。这时我才想起这位当报纸编辑的表兄，便从电话里和他商量，他让我把文章寄去。这篇短文，一下便发表出来了，我虽然很兴奋，但那时我一心一意想学医，写宣传文章只是赶任务，并不想继续下去。放园表兄却一直鼓励我写作，同时寄许多那时期出版的刊物，如《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等等，让我阅读。我寄去的稿子，从来没有被修改或退回过，有时他还替上海的《时事新报》索稿。他就像我的亲哥哥一样，关心我的一切。一九二三年我赴美时，他还替我筹了一百美元，作为旅费——因为我得到的奖学金里，不包括旅费——但是这笔款，父亲已经替我筹措了。放园表兄仍是坚持要我带在身边，以备不时之需，我也只好把这款带走，但一直没有动用。一九二六年我得了硕士学位，应聘到母校——燕京大学——任教，旅费是学校出的。我一回到上海——那时放园表兄在上海通易信托公司任职——就把这百元美金，还给了他。

放园表兄很有学问，会吟诗填词，写得一笔好字。母亲常常夸他天性淳厚。他十几岁时，父母就相继逝世，他的弟妹甚至甥侄，都是他一手扶持起来的。自我开始写作，他就一直和我通讯，我在美期间，有一次得他的信，说：“前日到京，见到姑母，她深

以你的终身大事为念，说你一直太不注意这类事情，她很不放心。我认为你不应该放过在美的机会，切要多多留意。”原文大概是这些话，我不太记得了。我回信说：“谢谢你的忠告，请您转告母亲，我‘知道了’！”一九二六年，我回到家，一眼就看见堂屋墙上挂的红泥金对联，是他去年送给父亲六十大寿的：

花甲初周 德星双耀
明珠一颗 宝树三株

把我们一家都写进去了。

五十年代初期，他回到北京，就任文史馆馆员，我们又时常见面，记得他那时常替人写字，评点过《白香山全集》，还送我一部。一九五七年他得了癌疾，在北京逝世。

还有一位表兄，我只闻其声，从未见过其人，但他的一句笑话，我永远也忘不了，因为他送给我的头衔称号，是我这一辈子无论如何努力，也争取不到的！

我有一位表舅——也不知道是我母亲的哪一门表姑，嫁到福州郊区的胪下镇郑家——因为是三代单传，她的儿子生下来就很娇惯，小名叫做“皇帝”。他的儿子，当然就是“太子”了，这“太子”表兄，

大约比我大七八岁。这两位“至尊”，我都没有拜见过。一九一一年的冬天，我回到福州，有一夜住在舅舅家。福州人没有冬天生炉子的习惯，天气一冷，大家没事就都睡得很早。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听见一个青年人的声音，从外院一路笑叫着进来，说：“怎么这么早皇亲国戚都困觉了?!”我听到这个新奇的称呼，我觉得他很幽默!

1985 年 7 月 25 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作家》1985 年第 5 期。)

致 王 安 忆

安忆同志：

你的小说集要叫什么名字？还有两篇东西未到我手里，就是《蜀道难》和《我的来历》，其他的我都看了，看全了就可以动笔。事实上，我了解得差不多了。我还好，就是老伴又进了医院，但不日可以出院。匆匆。

冰 心

八、三

（此信系周达宝同志征集。）

喜悦 期待

《儿童文学》这期编了一组福建作家的专辑，像这样集中刊载一省作家的作品，在《儿童文学》还是创举。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中国廿九个省市自治区都有各自的独特的山水、人物、花木、鸟兽。因此各省作家的作品往往都带有很浓郁，很丰富的地方色彩，本地风光。这一期多是福建作家之作。我是福建人，虽然居住在福建的时期很短，但我对于我父母之乡的感情，却很深厚，也爱读福建作家的作品。这期里，郭风同志的四篇童话散文诗，写得十分精彩而风趣。那篇《青蛙的旅行》，走过的就是福建特多的大榕树——福州城本有榕城之称。《麦芽糖人》是我熟悉的人。我最喜欢从他手里捏出来的花花绿绿的动物。而‘番婆’两字，是闽南话，指的外国女人，在北方我从未听说过。《布袋戏》就只在福州看见过，是比北方的木偶戏精彩多了！如火焰山，北方的木偶戏台上就搞不起来。《龙眼园里》这一篇更是福建独有

的。据说四川、广东也有龙眼，但是都不如福州的龙眼那么香甜！

舒婷同志是位很著名的诗人。在这一期里，她也写起小说来了。说的也是闽南的事：木棉树下，一老一少通过飞机模型的爱好的，表现出生死之交，这篇《飞翔的灵魂》是很动人的。

陈仲义同志的诗《章鱼看见什么都想要》里的章鱼和银鳗，我还看见过；但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电鳗这个鱼种，恐怕也是福建特有的吧？刘溪杰同志的诗《红鲤鱼和睡莲花》，也很有儿童情趣。

陈慧瑛同志写的《美丽的足迹》，生动真挚地记叙了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任教时的几个小故事。周云石同志的小说《描红了的航线》，是在儿童文学作品中比较少见的题材，反映了海峡两岸孩子渴望早日团聚的心愿。裴慎勤同志的《国王和狼》这篇童话也颇有情趣和哲理。这些作品都值得一读。

我满怀希望地期待着别的省份的专辑，使我增加些对祖国各地的知识。

1985年8月6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儿童文学》1985年第11期。）

致 肖 凤^①

肖凤同志：

信悉，我的中剪子巷 14 号故居，是进铁狮子胡同，南口，路西，不远。那大院恐已盖满房子了。1944 年我在四川应《大公报》之约曾写过四篇《再寄小读者》，自己也忘了（这次是卓如同志在重庆报上找出来的）。因此 58 年又写了《再寄》。至于《三寄小读者》到底有多少篇，那是登在上海儿童福利会出版的《儿童时代》上的，我自己也忘了是多少篇，他们可能有书可查。匆匆。

冰 心

八、八

① 肖凤，北京广播学院教授。

致 巴 金

老巴：

许久没给你写信了，你好吗？

文藻病了，住北京医院已两星期多，是脑栓塞，昏迷不醒，孩子们和特护们在护理。我要等他清醒时再去，孩子们说是有进步。心绪不宁，不多书，望你保重，亲亲小林！

大 姐

八、一五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致编委会^① 同志

编委会同志：

信收入。谢冰季，是我的三弟谢为辑，现在兰州。

我的大弟谢为涵（冰仲）已故，二弟谢为杰（冰叔）（化工部总工程师，在北京），都是随着我的冰心而来，你们猜对了。匆匆，祝笔健。

冰 心

八、廿四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①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编委会。

为《语文报》题词

教师们是最值得尊敬的人，他们为着祖国和人类的未来，为着把你们造就成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的合格接班人，而呕尽了心血！我希望你们不辜负他们的培育。

书应《语文报》之嘱

冰 心

（题词发表于《语文报》1985年9月2日第170期。）

我注意寻看安忆的作品

安忆来信说“上海文艺出版社要给我出一本中短篇小说集，这是我第六本集子了。我自觉这本集子对我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些东西都是我 84 年初从美国回来之后写的。思想感情、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等方面都经历了极大的冲击和变化……我非常非常地希望您能为我写个序，真的，非常希望。”

安忆的前五本集子，她都送给我，我看了，但每本都没有序，有的只有后记之类。在这一点上，我同她是相似的，我的集子从来不好意思请人作序。这次她要我为她这本“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的集子作序，我感到高兴而荣幸！

我注意寻看安忆的作品，是从她那一篇得奖的《本次列车终点》开始的。我有许多亲友住在上海，我很知道久住上海的人，对于上海的“热恋”，虽然上海的房子太少，人又太多。他们的孩子总不愿意离开

上海，宁可上普通中专，也不愿意到外地去上大学。我觉得安忆对上海人的观察和描写都很深刻，很细腻，可谓“入木三分”。另外我还喜欢一篇，就是《大哉赵子谦》，我觉得我的周围有不少学者都可以归“大哉”这一类，读着十分亲切，又从心底感到悲凉！

安忆的“少作”像《雨，沙沙沙》，是支优美的纯情的歌，那样年轻的优美的歌，是一般年轻的女作家都能写出的。倒是在她“失落”了“优美”，她的心灵“要求着袒露，要求着倾诉”之后的那些作品，却是十分地真实、朴素、细腻而深刻！她从“一团乱糟糟的生活中，看见了美好的闪光……生活中有许多阴暗、丑陋，可美好的东西终是存在，我总是这么相信着，总是怀着这样的心情看待生活”，我十分欣赏她的这种写作态度！

安忆一直住在上海，十六岁时做了上山下乡的“知青”，到了安徽宿县，那是个很穷苦的地方。（我记得美国女作家赛珍珠 Pearl Buck 曾告诉我，那本使她成名的小说《大地》Great Earth 就是以安徽宿县为背景的。）安忆所描写的上海和安徽的一切，都是我不熟悉或没有经历过的。但我能看出她敞开了胸怀，睁大了眼睛来观察，深入而又真诚地写出她看到的一切。她自己说“真诚是比一切都更为重要的，

失落了真诚，无论是做一个作家，做一个妻子，做一个人，都是不成的。”这也是使我惊叹而从心底欣赏和同情的句子。从我这大辈子的观察中，并不是每一个作家，都是把做一个作家的真诚，和做一个妻子（或丈夫）、做一个人的真诚，放在同一个立足点上来实践的！

这本集子里的十篇小说，据安忆说都是在她 84 年赴美，受到冲击和变化后的作品，这冲击和变化是什么呢？在她答复加拿大电影制片人戴安娜·博尔莉女士的话里，她说她愿意中国人民在富裕之后，“仍保留着一切传统民俗中美好的东西，不像当今西方社会那样人与人之间互相隔膜”（见《中国妇女报》1985 年 7 月 10 日《妇女作家一夕谈》）。

安忆自己说“在这几篇小说中《小鲍庄》是比较成熟一些”。这个，我也有同感。小说的背景是安放在“仁义之乡”的小鲍庄，每个人物如鲍五爷，捞渣以及一对对的情侣，小翠和文化子，拾来和二婶，都从纸上站了起来。读到可爱的小英雄捞渣死去的那一段，我的控制不住的眼泪竟落到了纸上！

其余的九篇：如《大刘庄》是《小鲍庄》的姐妹篇，不过里面兼写一伙城市的小青年。《我的来历》是记作者“寻根”的一切经过。《蜀道难》是最后到我手里的，写一对情人，男的似乎是医生，女的是护士，

在雾蒙蒙里从上海坐船到重庆说是要看三峡，其实要过一段同在的生活，最后男的还是想到母亲，要回上海，女的却消失在旅途之乐的重庆。《历险黄龙洞》是一群男女孩子糊里糊涂地想像大串连时期那样，去逛杭州的黄龙洞，却被解放军拦住了，最后却到了姑婆家里。另外四个短篇，《麻刀厂春秋》，是知青经历的一个侧面，写工业的因素在农村引起的冲突。《人人之间》是一位谦恭尽职的张老师和一个顽童王强新之间的故事，中间穿插一个“护崽子”的王强新的爷爷，读来觉得情节的发展都在情理之内，结果却在意料之外。《一千零一弄》是讲两位看管公共电话的好人，王伯伯和阿毛娘，他们对怎样才算尽职有着不同的看法，经常有着矛盾和磨擦。但当阿毛娘病倒的时候，王伯伯给她送去了麦乳精。《话说老秉》是形容一个杂志社里的老会计，他循规蹈矩，又勤俭节省甚至于吝啬。他辛辛苦苦攒了二十八年的工资两千元钞票，放在铁盒内，藏在墙壁里，却被隔壁每年生起的火炉，烤成灰烬，如此等等。

安忆写作的路子很宽，凡是她周围的一切，看到了就能写出。她还年轻，她的生命道路还很长很长，她还会深深地体会到新的悲欢哀乐！她说：“要使我的人生，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我的悲欢哀乐，我的我，更博大，更博大，更博大。”又承认，“我的人生

参加进我的小说，我的小说又参加进我的人生”。

对的，安忆，就这样地写下去吧！这样就写出了“真诚”，而“真诚”是写作的最强大的动力。

1985 年 9 月 7 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艺报》1985 年 10 月 5 日。）

希望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尊师

我们中国有几千年的尊师传统。我小时候上学时，父母带我去拜老师，看见墙上贴着一张红纸条，上面写的是“天地君亲师”，把师与天地君亲列在一起了。

我一生中受过很多老师的教导、照顾，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我当过老师，现在，我老伴和我两个女儿都是老师。我觉得，做为一个老师，很辛苦，也很快乐，老师可以从学生取得的成就和学生对老师的感情中得到很多的报酬。我给学生的东西不多，但得到了很多快乐。

十年动乱期间，尊师的风气被摧毁了。现在提倡尊师活动，听说有的同学要给老师买礼品，这大可不必。我觉得学生们尊师的最好的礼物就是拿出自己的好的学习成绩，这比什么都强，我在做老师的时候就是这样希望的。

老师应该自己努力，让自己值得尊敬，现在有的

青年教师不安心工作，有的师范院校的同学不愿当老师，这有多种原因。教师社会地位不高，工资待遇也低，这是原因之一。现在，我们国家正在逐步解决这个问题。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不少青年教师还不了解学生，还没有感受到当老师的快乐。我教过十年书，教大学一年级的国文，也教高年级的写作、戏剧。那时我才二十六岁，一年级的同学十七八岁，年龄差距不太大，我跟他们很能说到一起，与同学们很有感情，感到很开心。要与同学建立感情，要教好他们，就必须了解每个同学。我教一年级学生时，第一篇作文是让他们写自传，从他们的文章，从他们的脸上，了解他们过去的一切，他们做的许多事，以及每个人对听课的反映。

教师节到了，这是我们新中国的第一个教师节，我很高兴，人民终于觉悟了，知道了尊重教师的必要。我希望全国人民都来尊师，不仅仅是学生才尊师，希望不要仅在教师节这一天才尊师，要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尊师，把今年的教师节作为天天尊师、人人尊师的开始。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青年报》1985年9月10日。）

致 臧 克 家

克家同志：

十分感谢您的关心！文藻因心脏病，于七月廿七日入院，八月三日起，昏迷不醒，每天由儿女三对夫妇，轮流守护，此外还请有特护，医生正在抢救，暂时平稳。人老了，总得想到身后的事，我想这也是自然规律。我把他惦念的事办好了就行。您不要太忙于杂事，也不要太为老友伤心，好好休养。祝
好

冰 心

九、九

（此信系周达宝同志征集。）

致周达宝

达宝同志：

感谢你的来信，文藻自七月廿七日入院，八月三日起已入昏迷状态，但因医生尽力抢救，暂时还平稳，每天由我们孩子三对夫妇（吴青于前年回国），和我的侄儿女，轮流守护。我已将他的遗嘱（早写的）看过，遵嘱将他的存款三万元，全数捐民族学院研究部，做研究生奖学金，并已交出。我还好，谢谢。请你们两人自己保重！！

冰 心

九、十八

喜读袁鹰的《秋水》集

袁鹰把他的新出的散文集《秋水》寄给我，开卷即不能释手！“文章如锦气如虹”的几十个短篇，有的是忆旧怀人，有的是登山临水，有的是抒情咏物，有的是谈史谈文，写来都十分真实而自然。最可贵的是在真实自然里，还看出作者“读书破万卷”的痕迹。在袁鹰的散文中，常常引有古人的文句、诗、词，文章本身也是音调铿锵，大有散文诗的意味。这就是现在的青年散文作者所最欠缺的，他们对于本国的古文诗词读的太少了，不能很自然地写出有音调的句子。

散文当然首先要有真情实感，但也要情文相生，不识字的没有文化的人，虽然有真情实感，也写不出像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或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熟读古文、诗、词的人，写起文章来，就能“下笔如有神”，平仄协调，可以吟诵。现在以黑体代平声，以楷体代仄声，在《秋水》中举几个例子：如《南路上

的梧桐树》里（15 页倒数第 5 行）的“人去楼空，梧桐不语”；如《归来堂遐想》里（119 页第 3 段头一句）的“人世沧桑，中年哀乐”；《白歌会》里（169 页第 4 行）的“明月西沉，曲终人散”；如《读常熟来鸿》里（176 页第 3 行）的“一笺在手，遥望江南”等等，都是极其隽永的有声有色的句子。

我愿我的青年朋友们都来好好地品味这本可供学习借鉴的散文集。

1985 年 9 月 23 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艺报》1985 年 12 月 14 日。）

致 巴 金

巴金老弟：

你给吴青的信，我看到了。小林又写信又有长途电话，我真是感激！我是想得开的！他不死于反右期间，不死于十年动乱，逝世时已经昏迷了三个星期，没有显出什么痛苦，他不过比我先走了一步，八十四岁也不算短命，我是十分满足的。大家函电纷驰，劝我节哀。我们本来一切从“简”，但是新华社发了消息，又“繁”起来了。我很好，没有在人前流过一滴泪，心里也平静，你千万放心。谢谢上海的朋友。我一时还不能走开，有人到北京，请来坐坐。亲小林一口。

大 姐

十月四日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致 赵 清 阁

清阁：

两信均收入，你给我贺寿的片子，很好，谢谢！那时因忙于文藻的病，不及即复。文藻卧病将近两月，逝世时很安详。本来一切从“简”，不料新华社发了消息，变得“繁”起来了，日来接到不少国内外函电。我很想得开，他不死于反右及“四人帮”时代，而死于今天，比老舍、潘光旦……等朋友强多了！我很满足，身体也好，都说想不到，你千万放心。勿复。

冰 心

十、七、八五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回忆中的金岳老

虽然我的老伴和我们的许多朋友对金岳霖先生都很熟悉，但我和他接触的机会并不多。我能记起的就是在一九五八年和他一同参加赴欧友好访问团的短短的时期内的一两件小事，使我体会到了朋友们对于他性格的欣赏。

他有很丰富的幽默感！有幽默感的，尤其是能在自己身上找出幽默的资料的，总是开朗、乐观而豁达的人，使人易于接近。我记得有一次他对我笑说：“我这人真是老了，我的记性坏到了‘忘我’的地步！有一次我出门访友，到人家门口按了铃，这家的女工出来开门，问我‘贵姓’。我忽然忘了我‘贵姓’了，我说‘请你等一会儿，我去问我的司机同志我‘贵姓’。弄得那位女工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

就在这一次旅行中，有一天我们一起在旅馆楼下餐厅用早餐。（因为我们年纪大些，一般比别的团员起得早，总是先到先吃。）餐后，服务员过来请我

们在帐单上签上房间的号码，金老签过字后，服务员拿起帐单就走，我赶紧叫她回来，说“我的房间号码还没写呢！”金老看着我微微一笑，说“你真敏感”。那时左邻桌用餐的我们年轻些的团员，都没有听出他说的“敏感”是什么意思！

也是在这一次访问中，在英国伦敦，我们分别得到旅居英伦的陈西滢和凌叔华夫妇的电话，请我们去他们家晚餐。金老同陈西滢是老朋友，凌叔华和我是燕大同学，我们相见都很喜欢。可惜的是那天金老同陈西滢在楼上谈话，我却在地下室帮凌叔华做菜。以后晚餐席上的谈话，现在一点也记不起来了。

说起来已是将近三十年前的事了，此后的二十多年中，我很少见到金老，要有的话，也就是在人丛中匆匆一面吧。写下这些，使我仿佛看见一位满头白发，在一片遮阳的绿色鸭舌帽檐下，对着我满脸是笑的学者，站在我的面前！

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急就

（本篇刊于《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5月初版。）

漫谈集句

在五四运动以前，作为大学理预科的一个学生，我是专心致志地攻读数、理、化的功课的。但是我的好动的心情，常常使我的读书生活，钻出了理科的藩篱。我的小舅舅杨子玉先生给我买的清人诗词中有我偏爱的几本，如《龚定庵诗词集》、黄仲则的《两当轩集》和纳兰性德的《饮水》《侧帽》集；我尤其爱读龚定庵的诗词，他的七绝诗最多，光是“己亥杂诗”，就有三百多首，读的熟了多了，就能集成许多对联和七绝诗。这对于一个日夜翻读枯燥的理科课本的学生，是个绝好的换换脑筋的文字游戏。虽然诗中回肠荡气的词句，我当时并没有切身体会，但是连起来读，不但语气通顺，也还押韵合辙，有的句子，我认为就是天造地设的对联，如：

别有狂言谢时望

更何方法遣今生

又如：

烈士暮年宜学道
才人老去例逃禅

后来又看到他的许多句子，像是百十块五彩斑斓的积木，随手拈来，都能盖成七宝玲珑的楼阁。如：

风云材略已消磨
其奈尊前百感何
吟到恩仇心事涌
侧身天地我蹉跎

光影犹存急网罗
江湖侠骨恐无多
夕阳忽下中原去
红豆年年逐逝波

也有不颓丧的，如：

不容水部赋清愁

大宙南东久寂寥
且莫空山听雨去
四厢花影怒于潮

还有带些香奁意味的，如：

三生花草梦苏州
红似相思绿似愁
今日不挥闲涕泪
一生孤注掷温柔

还有一首是这样的，

秀出天南笔一枝
天将何福予峨眉
他年金匱如搜采
坐我三熏三沐之

如果能把“我”字换成“汝”字，我就可以把这一首“集龚”赠给任一个我所欣佩的南方女作家，可惜原文是个“我”字，只好“束之高阁”了。

要写的文字，又不知从何处写起。半夜醒来，却猛忆起少年时代的“集龚”，只记得这几首了，写出

以博老读者一笑!

一九八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清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天津日报·文艺》1985年第6期。)

衷心的感谢

文藻离开我已经整整一个半月了。这一个半月，我是在周围一片慰唁声中度过的！不但几乎天天有朋友和亲人来慰问我，还因为新华社发了文藻逝世的消息，我收到了从国内国外发来的一百七十多封的唁电和唁信。有一些发电或发信人的名字是不熟悉甚至是不认识的。我昨天才有心绪来从头阅读那一大堆函电，我仿佛突然发觉，原来他还有那么多的同行，那么多的朋友，那么多的学生；原来我们还有那么多的了解、同情、关心我们的人！我忍不住涌出了感激的热泪。

电文大都简短：哀悼他的逝世，请我节哀。而从那一百多封字数较多的唁信里，我看到了他的朋友、学生们心中眼中的吴文藻——他的生平、他的为人、他的遭遇……写出了和我共同生活了五十六年的吴文藻！

我只能摘录这许多信中的几封：

吴先生对我国社会学与民族学建设运动，有过杰出的贡献，并培养出许多接班人，成为我国这门学科的奠基人和大师。他的逝世实是我国学术界一大损失。

——杨 翼

文藻同志和我在清华学校同窗多年，他虽高我一级，但彼此情同手足。他是我国社会学的先驱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学被长期忽视，直到今天才受到了尊重。正需要他时，他又溘然长逝。哲人其萎，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

——周培源

我们自昆明读大学起就不断亲聆文藻师的教诲，阅读文藻师的著作，受益匪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文藻师学识渊博，治学谨严，对学生诲而不倦，为我们树立了楷模。文藻师一贯重视社会学人才的培养，并为此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学习的……

——袁方、全慰天等六人

他老人家在燕大时，对我们的教导，我们永

远也不会忘记的。我们虽身在国外，也常常通过“美中人民友好协会”，为祖国谋幸福，为祖国工作，以期不负他老人家的教诲……

——苏厚彬

吴老对我的科研工作，给予亲切的指导，我定永志不忘。今后我将以自己的实际工作，来报答吴老的谆谆教诲……

——宋维真

藻师是世界知名的学者。藻师为人耿直，一生诲人不倦，我追随师侧，时间不多，但对我一生的学习和工作，起了不可估量的楷模作用。我常向藻师汇报学习和工作情况，他老人家无论多忙，身体又不太好，总是亲自给我回信，一次是在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时坐在院子里小凳上写的；一次是在眼力差、写字手抖的时候写的。藻师对于晚辈也毫不疏忽……

——李 镇

我和文藻先生接触不多，但对先生对社会学的贡献，一向是景仰的，同时对文藻先生一九五七年的错划右派，也一直愤愤不平的。文藻先

生遗愿不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使我没有表示哀思的机会……

——千家驹

文藻先生笔耕一生，对学术界建树卓著，晚年屡遭颠沛，而报国之心不减，是我们后辈的楷模……

——袁 鹰

我作为您和藻师的弟子，已经五十四个头了，这是天翻地覆的五十四年。你们给我的教导是：爱祖国、爱人民。在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你和藻师就是为祖国的现代化而努力，我也在实践你们的教导……海外有不少关于藻师生平的报道我正在搜集……世界在变，每人都在变化中扮演一个角色，藻师的角色演完了，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他都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一位终身致力于祖国现代化的学者……我很快就要回国了，如有可能我想为藻师编一本文集……

——李有义

不必再多抄了，我将遵照一位小朋友要求我的话，写点东西。她说：“我希望吴伯伯能在您笔下重

新得到生命!”

1985 年 11 月 7 日大雾之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汇月刊》1986 年第 1 期。)

致 巴 金

巴金老弟：

昨天下午吴泰昌急递来你送的上海法国面包，非常之新鲜，第三代人馋得了不得，先打开吃了几块，后来第二代人（吴青她们）又吃了几块，我只好请人收起，不让她们再去闹，我是今天早餐时才吃的，可惜的是北京什么都没有。所谓之“宫廷糕点”者，真不知当年那些皇帝以及王公贵人，如何下咽！听说你还好，茹志鹃来看我，要我去上海，我何尝不想去和你们谈谈，只是我行动不便，旅行更要麻烦许多人。人老了，真没意思，家人朋友一个一个地离开你，自己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有益于人们的事。我这人真是眼高手低，觉得现在有些很好的作家，写得越来越低级，越来越草率，天天高谈“社会效果”，笔下却不是那回事，《收获》是一份好月刊，还要好好“把”一下“关”。

我常常想你和小林夫妇和端端，到底不是住在一个城市，通个电话也费事！昨天正在重读《探索与回忆》，恰好吴泰昌就来了，吴青笑说“他头发也长了，一身衣着，大有港澳华人意味”。纸已尽，不讲笑话了。祝你平安，亲小林一口。

大 姐

十一月八日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致 宫 玺

宫玺同志：

你病了还给我写信，十分感谢。不知您病后调理得怎样？不要太为我的文集费心！

文藻逝世后，一切十分简单，只因新华社发了消息，以致函电很多，友人来的也多，我都来不及函谢。看见上海朋友，请告诉他们我很好，并没有太过悲痛。生命的规律，就是如此，我自己也已经八十五岁了。匆匆即请
痊安

冰 心

十一、十一

为整治西湖题词

勤劳勇敢的福州市人民已在着手整治疏浚我们美丽而受到污染的西湖了，消息传来使我欢喜而兴奋，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我亲爱的乡亲们齐心努力之下，使得国内外来我故乡观光的旅客，看到在三山叠翠、榕荫掩映之中，更荡漾出西湖水面一片清莹透澈的晴光。

冰 心

1985年11月16日

我为什么写《樱花赞》

在我 1947 年去到日本之前，我对日本没有好感，对樱花更没有印象。

抗战胜利后的 1947 年冬，我到战后的日本去，在羽田机场下了飞机，又从横滨坐汽车去到东京，路上看见从前这一条繁华热闹的长街，现在竟是一片瓦砾，没有一座房子！到了东京也是满目荒凉，路上行人也是衣衫褴褛，形容枯槁。我在美国留学时的日本同学，知道了我到东京的消息，就都来看我，她们也是憔悴不堪，相见之下，都不知说什么好！这时我才深切地体会到：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不但有中国人，也有千千万万的日本老百姓。我在日本呆了五年，中间还在日本东京大学，教过“中国近代文学”。我接触了许多日本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1951 年回国以后，又参加过多次的赴日友好访问团，有机会接触到日本的工人、农民、渔民，在频繁的交往之中，我不知不觉地爱上了日本人民之所爱——如樱花，

也憎日本人民之所憎——如军国主义者。这篇《樱花赞》就是在 1961 年，一次赴日访问后，回来写下的感想。

1985 年 11 月 18 晨

喜读萧乾《漫话北京城》

七十六岁的名作家、名记者、曾在海外浪迹多年的萧乾同志，最近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漫话北京城”的短篇。因为他是我的小朋友，我等不及他全文发表，要先读为快便向他索要了文稿来看。他这十篇短文的小题是：《市与城》、《京白》、《吆喝》、《昨天》、《行当》、《方便》、《痕迹》、《花灯》、《游乐街》和《市场》。这几篇散文从各个侧面把我们伟大祖国的伟大首都描写得有声、有色、有香、有味……引起了我对“昨天”的北京的回忆，引起了我含泪的微笑。文章里的许多事情，都早已不会在我和第二代、第三代人的谈话范围之内了，因为说了他们也不会看到听到的！

但是我知道有许多海外的同胞，特别是许多老年人，对于祖国、对于童年时代的北京，有着亲切的回忆、向往与留恋。老北京人民的生活——吃的、玩的和用的，老北京人民的礼节——说的和做的，都在

“老北京”的脑海中不断地萦回。我很同意作者在末文之末说的那几句话：“四九年以后，咱们这座古城也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现在看来，换骨（城市建设）固然不易，砖得一块一块地砌；可脱胎（改变社会风气和市民的精神面貌）更要难。然而那正是市格的灵魂。”

据说这篇两万字的文章，会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我愿意我的思乡怀旧的海外同胞们，能够和我一同欣赏这篇用流畅俏皮的“京白”写的关于祖国古北京的文章！

1985年11月20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瞭望》海外版1985年12月改版试刊第4期。）

我与散文

散文是我写作时最常用也最爱用的文学形式。

理由也很简单，在我充溢的感情要求发泄的时候，散文就是一种最方便的工具。因为，要用诗的文学形式来写，对于我就太费事了！我总以为诗是“做”的，不是“写”的。诗要合辙押韵，音调铿锵，读了使人能背诵下来。我不是一个诗人，慢慢地“做”起来，浓郁的情感，就会渐渐地消失了。其他的文学形式，如剧本、甚至于童话，我都没有写过，也不敢尝试。

散文的内容很宽泛，通讯，记事，写人，状物的文章……都可以包括进去。因此写散文的人也多。但是写得好的却比较少，即使是有名的散文作家，他的散文也不是篇篇都好，这里面也还有“际会”问题。他写作的对象，不能使他的情感奔腾闪掣到了最高尖，他的笔下就自然而然地平淡了下来。从古今中外名作家的文集里，我们都可以看出这一点，也就是

说，不是每一篇都能使人加圈的。

当然，好的散文不多，也还有文学修养问题。情感有了，如没有合适的文字把它表达出来，这情感也就削弱了，淡化了，甚至于消失了。

此外，这里有读者的爱好与品味问题，这又同音乐，绘画……的欣赏一样，观赏者的训练不同，性格不同……喜爱的对象也因之而异，这也是很自然的。

关于散文，我一向谈的够多了，就此打住吧。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晨急就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一股“黄山的人字瀑”

——推荐《经济和人》

读完《十月》一九八五年第六号上的报告文学《经济和人》，更加证实了我读《祖国高于一切》以后，对于报告文学家陈祖芬的看法。这位年纪很轻的陈祖芬，似乎是专为描写我们祖国的、值得大书特书的人和事而出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女作家。

她满怀着炽热的爱国情感，以一双有着对生活强透视力的眼睛，看到了一座只有二十万人口的中国小城市——安庆。这座浮出水面的小小的安庆城，正在召开一个裹挟着一系列经济问题旋风的“窗口经济”会议，她便来到了这个会议中间，像一头生机蓬勃的幼狮，抢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绣球，就欢喜腾跃地和它一起摸、爬、滚、打，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

陈祖芬曾说：“我们报告文学难道不应当增加节奏感、信息量、幽默感、空间感、多变性、随意性吗？”在这篇《经济和人》里，她交出了一份满分的答卷！

我作了统计，在这研讨“窗口经济”的会议上，围绕着“王峻和孙超分别是安庆内贸窗口和外贸窗

口的两块牌子”转的，还有好多位领导干部，如博学多能的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改革狂人——安庆市政府副秘书长；为王峻和孙超解决贷款问题的安庆市副市长，此外如安庆市委和市府的几位领导也都是发现和支持王峻和孙超这两块牌子的干部。此外，还有报刊界人士。

孙超说：“改革的人愈多愈好……应该团结大家一起干……是领导给我们开路，否则我使出浑身解数也不行……我没那么多领导支持不行，人家说我胆大，胆大就大在这里。”

《经济和人》就是写王峻和孙超这两块“经济窗口”的牌子和以安徽省人大副主任苏桦为首的领导干部们怎样地在这会议舞台上，合唱出一首“团结一致、振兴中华”的凯歌。

作品最后，陈祖芬酣畅淋漓地描写着受到巨石阻挡，而仍能奔腾直泻的黄山瀑布。她说：“我看见那瀑布从山顶飞下，叉开成人字形直泻下来……千差万别的、千千万万的人字组成的巨大的人字瀑，像大写的人字，挥写在整整一面黄山上……你是在向我展现人的力量吗？”

陈祖芬说过：“一部作品能打动读者，往往不是因为文笔华丽或手法别致，而是因为它们蕴含的精神力量、思想力量……”

我觉得这篇《经济和人》给我的印象，也就像黄山的人字瀑！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汇报》1985 年 12 月 30 日。）

读了《北京城杂忆》

读了萧乾的《北京城杂忆》，他那流利而俏皮的京白，使得七十年前的北京城的色、香、味，顿时萦绕而充满了我的感官，引起我长时间的含泪的微笑！

萧乾是我小弟弟谢为楫的小学同学。他十几岁时就常到我家来玩。一九二六年我从美国学习回来，那时他是北新书局的小职员，常来给我送稿费。他一面从拴在手腕上的手绢里拿出钱来，一面还悄悄地告诉我，这一版实在的印数不止三千册……此后他还在燕京大学上过学，在《大公报》当过记者。这几十年来，无论我们在国内或海外，都没有停止过通信。他算是和我相识时间最长的老朋友了。

他在《北京城杂忆》里，所谈到的七十年前北京的吃的、喝的、玩的、乐的，凡是老北京一般的孩子所能享受到的，他都满怀眷恋地写到了。但是孩子和孩子又有不同。那时的“姑娘”和“男生”，就没有同等的权利！他和我小弟坐过的“叮噠车”——有轨

电车，我就没有为了尝试而坐过。我也没有在路边摊上吃过东西。我在上学路上看到最香的烤白薯和糖炒栗子，也是弟弟们买来分给我吃的。

谈到“吆喝”，至今还使我动心的，就是北京的市声！夜深时的算命锣声，常使我怔忡不宁。而“硬面饽饽”、“猪头肉”和“赛梨的萝卜”，也往往引起我的食欲，而我只吃到“赛梨的萝卜”，也还不是自己出去买的。

谈到“布局与街名”，我很有兴趣。我童年住过的中剪子巷，我认为一定曾是个很大的剪子作坊，因为在这条巷的前后，还有“北剪子巷”和“南剪子巷”；还有我上中学时的“灯市口”，上大学时的“佟府夹道”和“盔甲厂”，这都是与住户的社会身份或职业有关的命名。这时我忽然想起在东城有紧挨着的“东厂胡同”和“奶子府”，一定是明太监魏忠贤和皇帝的奶妈客氏的第宅所在地。

谈到“游乐”，我连天桥和厂甸都没去过！我只逛过隆福寺庙会，因为它离我们家最近，是我舅舅带我去的。在人群里挤来挤去，我什么也没看清，只在卖棕人的铜盘边留连了一会儿，看那些戏装的武将，在盘子上旋转如飞，刀来枪往，十分有趣。

总起来说，我对老北京的印象，并不像萧乾那么好，因为它和我童年住过的海阔天空的烟台，山清水

秀的福州，都比不了。我在《寄小读者》通讯二十里曾写过：

北京只是尘土飞扬的街道，泥泞的小胡同，灰色的城墙，流汗的人力车夫的奔走。我的故乡，我的北京，是一无所有！

当然我也写了我仍热爱北京！因为这座城里住着我所眷爱的人。今天呢，大街小巷都铺上了柏油，尘土和泥泞没有了，灰色的城墙不见了，流汗奔走的人力车夫也改行了。因此我说，我对北京的喜爱是与日俱增的。

只有一事，我和萧乾有深切的同感，就是在礼貌和语言上，现在的北京人的“文明”程度，比七十年前的北京人就低多了！

还有就是在招徕旅客方面，我也觉得让外国客人住四合院，吃中国饭，比让他们住上“惟妙惟肖”的洋式饭店、吃西餐，更有吸引力。君不见，到蒙古旅游的人，都喜欢住蒙古包、喝奶茶、吃羊肉嘛？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建设》1986年第3期。）

致 巴 金

巴金老弟：

这也是我第五次提笔了！得到你的信，又有吴泰昌从广州回来，带来了小林送给我的香蕉，想她们已回到上海了？总想写信谢谢，也是一声门铃响，或有电话等等而中断了。我不像你那样，有那么多客人，但每天仿佛总有人有事，来打断我要做的事。记得我母亲曾对我说“事情和生命一般长”。人活一天，总有一天的事，你不要为此而睡不好觉，也不要着凉，感冒了是很不舒服的。我有一样好，就是不大感冒，当然和不出门也有关系。你说叫吴青写信，她比我忙多了，整天不着家。该她管的事，管；不该她管的事，也管，不是家事！

这封信是谢谢你那封长信，我知道对你是多么不容易！北京不冷，没有雨也没有雪，太干了。我愿你健康，希望看到你的文章，但又不愿你累，矛盾得很！沙汀昨天叫人送他的书来，叶老仍在医院。匆祝

新年好！

大 姐

十二、廿九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致陈慧瑛^①

慧瑛同志：

《无名的星》拜领并已拜读，可谓文情并茂。我尤其喜欢祖国和故乡那一段，希望您再多写下去，我为故乡又多一位女作家而高兴！……厦门我到过，但未久留，将来如可能，一定拜谒！

祝您笔健，并贺

新禧

冰 心

1985、12、29

^① 陈慧瑛，女作家。祖籍福建省，1946 年生于新加坡。1967 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主要作品有散文集《无名的星》、《月是故乡明》、《芳草天涯》、《竹叶三君》等。